

德國出兵政策的國際關係 理論再檢視--從科索沃到 阿富汗的國會辯論探討

王順文*

- 一、前言
- 二、國際關係理論的論述與德國出兵政策
- 三、德國在科索沃的出兵行動與論述
- 四、德國在阿富汗的出兵行動與論述
- 五、綜合分析
- 六、結論

本文檢視德國從科索沃到阿富汗出兵政策的核心考量，並從聯邦議會的辯論過程中，探討不同政黨於不同時期之間所主張的核心考量與立論依據，進而回應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德國出兵政策適用上的爭議。

本文發現，新制度主義一如多數學者所主張的，在相關論述

*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Email: shunwenw@gmail.com

投稿日期：2013年3月12日；接受刊登日期：2013年10月4日。

東吳政治學報/2013/第三十一卷第三期/頁1-63。

上確實是最常被提及的，其次才是現實主義，相對而言，歷史文化論的主張確實是在論述上較少提及。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種現象，在任務開展之時，現實主義反而是最重要的論述，而一旦任務開展之後，現實主義與歷史文化論的論述便明顯下降，而變成新制度主義論述一枝獨秀。這樣的說法，與 John S. Duffield (1998) 的說法大致符合，也顯示德國出兵政策的系統性與一致性。

關鍵詞：德國出兵政策、科索沃、阿富汗、國際關係理論

一、前言

本文檢視德國從科索沃到阿富汗出兵政策的核心考量，並從聯邦議會的辯論過程中，探討不同政黨於不同時期之間所主張的核心考量與立論依據，進而回應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德國出兵政策適用上的爭議。

德國出兵政策在統一後的演進一直被許多文章討論，¹ 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德國出兵政策解釋上的無奈與各自為政，更是明顯。因此有學者指出，唯一可以解釋與預測德國的出兵政策的就是他的「不可預測性」(Markovitz and Reich, 1997: 25; Martinson, 2012: 390)。而傳統國際關係的三大理論（包括現實主義、新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都試圖對德國出兵政策提出解釋，也都面臨質疑。²

-
1. 這些文章大致分別探討德國角色扮演與外交政策的成效、德國角色的衝突以及法律扮演的角色等層面著手。首先是外交政策的成效與角色扮演部分，包括：吳東野 (1993, 1994)、湯紹成 (1997, 2001)、熊焯 (2008)、Fischer (2007)、Günter Joetze (2001)、Heinz Loquai (2000)、Joachim Krause (2005)、Marcus Hawel (2007)、Kåre Dahl Martinsen (2005)、Rainer Baumann and Gunther Hellmann (2001)、Sebastian Harnisch et al. (2004)、Rafael Biermann (2002)、Hanns W. Maull (2006)、Franz H.U. Borkenhagen (1997)、Martin Kanz (2003)、Heiko Biehl et al. (2000)、Jörg Jacobs (2006) 與 Nils-Johan Jørgensen (2006) 等文都個別處理這方面的問題，包括正常化、個別政策的成效、德國國家與士兵等角色扮演等。在法律層面的文章方面，則探討合法性的問題，包括 Ute Erberic (2004)、Paul Klein and Dieter Waltz (2000) 與 Andreas Gilch (2005) 等文皆是如此。
 2. 比方說 John S. Duffield (1998) 認為在相對和平的時期，國際制度與政治文化兩個因素是研究統一後的德國安全政策兩個重要的變項，但相對不穩定時則仍是現實主義 (Duffield, 1998: 15)，並認為德國安全政策其實是包含新現實主義、新制度主義與政治文化的，要下定論說何者為重仍然太早 (Duffield, 1998: 8)，這種看法雖然在 1998 年就已經提出，但

Jeffery D. Martinson (2012)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透過將政治人物論述量化與國際關係理論基本論述進行分析，他主張正因為政治人物的說話基本上是混用的，不一定會固定在一個國際關係理論上面，³ 而這也是國際關係理論顯得無法完全解釋的原因 (Martinson, 2012: 396)。因此，他將研究內涵主要放在政治人物在國會中的論述，以分析哪種理論影響最大 (Martinson, 2012: 397)，⁴ 本文亦將採取同樣的研究基礎，針對政治人物的論述與政府提案進行研究，由於相關提案 (Drucksache) 與政治人物的論述，特別是政府提案，已精確的表現政府對於本文所研究之特定案例的相關態度，再者，國防白皮書或政策宣示等雖有針對大的戰略方向進行論述，但並未針對本文所提及的相關案例進行細部論述，因此，在資料的分析上面，仍以相關提案與國會辯論為主。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採用如同Klaus Krippendorff (2004) 一書所提到的質與量的內容分析法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內容分析法的中心概念是將文件中的許多文字歸類成很少

從 Martinson (2012) 年的文章仍指出，各主義之間各擅勝場，也各自受到質疑的情況仍未改變。

3. 他將出兵政策的理論分類從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與文化主義擴大為四種不同的本體論與論述，包括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歷史主義與全體主義，並進行量化分析得到結論。
4. 他並指出，將研究放在國會辯論上面有理論上與方法上的原因，理論上來說，因為政治人物在此處發言較之於其他私人場合，將缺乏提出替代選項的空間，並可能對事物較真誠 (more heartfelt) 看待……理論上來說，此將更可將研究放在領導者的政治心理……對於將重點放在國會辯論而非內閣會議等批評，該作者指出，經歷了過去歷史上行政權濫用的情況，國會目前為最重要決策中心，也被憲法法庭所支持。而在方法上來說，這些資料均可在網上取得，且政治人物的言論是以「天」為單位計算的，有助於長期觀察其變化……並有助於探討政黨由左至右的光譜上之變化 (Martinson, 2012: 397-8)，因此，不同的研究者並可實證檢視研究的「再現性」，並提出修正，符合本文之研究方法。

的幾個內容類別，爲了至少要呈現如同Klaus Krippendorff (2004: 215) 所強調的內容分析之再現性，⁵ 本文雖然不採取與Martinson (2012) 以量表的方式進行統計軟體的分析，但根據其關於國際關係理論論述的內容類別而採取質性研究的深入分析，本文不在於「測試」既存的理論的有效性 (Ragin et al., 2004: 41)，但是將結合同樣的分析方式，並將案例進行系統性的分析。

本文雖然在理論的分析上，採現實主義、新制度主義、歷史與文化論者的分類取代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⁶ 但在相關理論的內容與論述歸類方面，仍採取與Martinson (2012) 同樣的標準。本文認爲，藉由不同政黨之間在不同時期政治人物於聯邦議會 (Bundestag) 中的論述，進而分析哪些因素在該政黨中以及不同時期所扮演的角色的方式有助於瞭解出兵政策，但將科索沃與阿富汗出兵政策化約成一件出兵案來看，並進行簡單的量化分析，有可能會過度簡化結果，因此本文擬採質性研究，細部分析科索沃出兵政策中包括「建立秩序行動」(Operation Activation Orders, ACTORD)、
「撤出部隊行動」(Extraction Force) 與「盟軍空襲行動」(Operation

5. Krippendorff (2004) 提出內容分析的信度可分為「穩定性」(stability)、「再現性」(reproducibility) 與「正確性」(accuracy) 三種，並以再現性為基礎要求。

6. 這個分類方式主要是因為以建構主義研究德國出兵政策的學者在研究方式上較為不統一，且因其強調「互為主體性」，主張德國出兵政策會受到國際與社會規範的同時影響，有些較強調國際規範上的合法性，包括國際法、相關國際條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或其他相關組織中的相關文件 (Baumann, 2001: 145)，雖然也受社會規範因素的影響，但認爲德國還是只會在有國際法基礎上出兵 (Baumann, 2001: 168)。不過這樣的主張常常會與自由制度主義者相重疊，甚至有可能會有以所有變項（包括國際與國內規範、制度、法律、文化等）來解釋事件之虞。而雖然 Christian Freuding 在分析相關德國出兵行動的案例後，主張建構主義最具解釋力 (Freuding, 2007: 46)，但基本上他也是從歷史與文化等角度來出發，而由於強調歷史主義者通常也強調因歷史所產生之文化之影響，因此，本文不擬將兩者分開討論。

Allied Force) 以及阿富汗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International Stability Assistance Force) 及其延長案等案例。

本文選擇科索沃與阿富汗出兵政策作為分析案例，科索沃及阿富汗的出兵行動，除了是德國出兵政策走向「戰鬥任務」的開始與代表性案例，科索沃的出兵如同施洛德總理所說的，是德國在二次戰後首次參與戰鬥任務 (Bundestag, 2002b: 2572)，而阿富汗的出兵則是德軍在二戰後出兵人數最多的任務 (Bundeswehr, 2012)。

同時，希望透過科索沃與阿富汗兩個實際的案例與政治人物的說法，實際分析主要政黨在不同時期、執政與在野以及任務開展與延長等三種分類方式，並結合相關理論，綜合來瞭解德國政治菁英在出兵論述上的看法。而在政黨的選擇上面，則以其是否能夠取得黨團資格作為各階段判斷的標準。蓋根據德國聯邦議會議事規則第 106 條設計，超過 5% 的國會議員或黨團，都可以針對特定議題提出辯論要求 (Bundestag, 2009; Dieterich et. al, 2010: 24)，此設計的概念是希望讓不同意見能夠表達，使行政權能夠理性判斷並決策。因此，在政黨的選擇上，除了有參與執政的「基民/基社聯盟」(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 CDU/Christlich-Soziale Union in Bayern, CSU，以下簡稱基民黨)⁷、社民黨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自民黨 (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FDP) 與綠黨 (GRÜNE) 外，雖然極左政黨，也就是早期的民主社會主義黨 (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PDS，以下簡稱民社黨) 與改名後的左翼黨 (Die Linke)

7. 因為基社黨的角色主要只有在巴伐利亞邦，甚至一般通稱的「黑黃聯盟」的黑色，也是基民黨的代表色，因此為求行文方便，以下論述到黨團意見時，將簡稱基民黨。

⁸ 目前尚無聯合執政的案例，但本文仍依其是否掌握黨團的能力，也就是其是否掌握可以發動辯論要求的能力加以納入。⁹

二、國際關係理論的論述與德國出兵政策

本文首先針對國際關係理論的論述進行分析，進而與案例相結合。

(一) 現實主義者研究與論述

現實主義者強調德國的「正常化」(normalisation) 政策，認為統一後的德國將採取一個較不受限制的 (less restrained and benign) 的作法 (Longhurst, 2004: 4-6)，在解釋出兵問題上，他們認為德國決定出兵與否是根據權力與利益因素 (Harnisch and Maull, 2001: 119)，而非文化、民意等因素，更非如建構主義所說的認同或規範因素。¹⁰ Brian C. Rathbun甚至認為所謂德國具有「和平主義傾向」

8. 該政黨前身為東德的統一社會黨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ED)，後於 2005 年改名為左翼黨，主要的政治人物包括 Gregor Gysi 以及原為社民黨的 Oskar Lafontaine 等人。

9. 民社黨 (PDS) 在 1998-2002 年以及 2005 年之後都為聯邦議會主要黨團之一，擁有超過 5% 的席次，而 2009 年改名為左翼黨後，得票率更是提升，甚至比綠黨更多，加上許多政治人物皆是從社民黨所分裂出來的，因此，實難視其為幾不可能執政或影響政策的政黨。

10.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為 Max Otte 將其博士論文出版的 *A Rising Middle Power?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formation 1989-1999* 一書 (Otte and Greve, 2000)，此書根據現實主義觀點，來分析德國的安全政策，並分析德國在三種情況是屬於無法承受的，包括：(1) 美軍撤出歐洲；(2) 德國貿易領域（特別是歐盟）的毀壞；(3) 東歐國家的對抗，並據此分析德國在統一後變成了「修正主義的強權」(revisionist power)，雖然相對權力並無顯著的增加，但是還是會傾向新現實主義 (2000: 9-10,59)。其他從新現實主義來研究德

是一種迷思，因為德國在決定出兵與否的時候，基本上還是自利的行爲 (Rathbun, 2006: 72)。¹¹

大體上而言，若我們歸納政治人物的言論，如果牽涉到現實主義的常用語言包括：利益與利益最大化、戰略的計算（包括武力使用對戰略上的重要性與國家戰略的安排）、物質條件、世界地位、強調「德國」的角色或其他國家的行爲（如探討英國、法國、美國或俄國等其他國家的行爲與決策，做出因應措施，以及盟邦的角色）等 (Martinson, 2012: 396)。

(二) 新制度主義的研究與論述

新制度主義者認為透過制度的合作，可以加強互信、嚴守承諾，並締結國際典則，使國際社會逐步朝結構化、文明化邁進 (蔡政文，2007: 7)。在德國出兵政策的研究上，新制度主義者皆強調制度與典則對德國出兵行動的約束力，如 Wolfgang Wagner 便認為德國因為受限於制度的壓力，使其必然會走向境外出兵的任務 (Wagner, 2005: 467)。¹² 也有從文明強權 (civilian power)¹³ 的角度出發，同樣強

國出兵政策的學者還包括 Christian Hacke、Gregor Schöllgen、Robert B. Zoellick 及 David Anderson 等人，也都主張德國會多注意自身利益，並會採取選擇性合作及追求在北約及歐盟中的領導角色 (Otte and Greve, 2000: 197)。

11. 其他還有如 Michael Stürmer 於 1986 年在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 提倡德國應該為權力政治預作準備 (Hawel, 2007: 191)。

12. John S. Duffield (1998) 也認為在自由民主國家且政治權力較為分散的國家，如德國，同時在相對和平的時期，國際制度與政治文化兩個因素是研究統一後的德國安全政策兩個重要的變項 (Duffield, 1998: 15)。Joey Cloutier et al. (2004) 強調沒有一種理論可以解釋所有的出兵案例，但主張德國政治文化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制度因素不僅僅對德國產生影響，德國在強化這些國際制度上扮演了領導者的角色 (2004: 128-9)。Thomas Jäger (2007) 也指出德國的外交政策受到國際體系、國家相

調權力與互賴的重要性，使得國家必須藉由「安全典則」的建立，以取代軍事行動、降低動武成本與確保集體安全，並保障繁榮 (Harnisch and Maull, 2001: 4; Tewes, 2002: 10-11)。¹⁴ 而作為文明強權的德國，因為其國家利益就是建構在這些價值上面，除了強調國際法與制度的重要性，當集體決議要採取武力干涉，文明強權亦不會拒絕參與 (Wölfle, 2005: 18-20)。

政治人物在使用新制度主義的概念時，其論述之語言不外乎為：強調制度（如聯合國、北約、歐盟等）、法制結構（國際法、基本法、憲法法庭的判決之重要性）、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性、程序正義等 (Martinson, 2012: 396)。

(三) 歷史與文化論者的研究與論述

歷史與文化論者著重在兩次的世界大戰之失敗所產生的影響，Andreas M. Rauch (2006) 及 Joachim Krause (2005) 皆認為影響德國

互依賴、權力以及國際組織及國際典則的影響。

13. 雖然 *civilian power* 的翻譯方式有所爭議，比方說郭秋慶 (2006) 一書中翻譯成文明強權，甘逸驊 (2007) 則翻為「柔性強權」，亦有學者指稱應該翻作非軍事強權等，但觀其意義，文明強權並非不從事軍事行為，只是希望透過較為文明的手段，如非暴力、政治解決等優先原則，希望能夠達到外交政策的目的，但是這並不代表他就是非軍事強權或者是柔性的軟權力 (*soft power*)，相反的，他還是可以透過軍事的力量來改變人道危機的狀況，促進文明化與非暴力化，因此，本文還是沿用郭秋慶教授的翻譯，以文明強權翻譯較佳。
14. 這類學者並認為出兵政策要達成六個目標，包括：(1) 限制使用武力：支持合作且支持集體安全的安排；(2) 強化法規的重要性：藉由多邊的合作發展相關的國際典則 (*international regimes*) 與國際組織；(3) 民主參與原則：強調決策參與的形式要具備民主；(4) 暴力使用的限制：促進非暴力形式的衝突解決；(5) 社會正義：促進社會公平與永續發展，以增進國際秩序；(6) 相互依賴：促進相互依賴與國際分工 (Harnisch, 2001: 37)。

出兵政策的第一個歷史因素來自於威廉二世因為忽略政治外交途徑的重要性，而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並導致自己孤立無援的結果，而形成「不再孤單」(never alone) 的戰略文化 (Rauch, 2006: 24-26; Krause, 2005: 47-48)。第二個因素便是希特勒 (Adolf Hitler) 與二戰的經驗，形成所謂「不再犯錯」(never again) 的戰略文化，強化人道救援並產生「對軍事行動上心靈的撫慰」(Militärseelsorge) (Rauch, 2006: 47)，解決其出兵上的障礙。其所展現出來的就是「責任政治」(Politik der Verantwortung) 與自我限制的態度 (Löffmann, 2008: 50)。

而因為歷史所產生的文化因素，也影響著德國出兵政策，¹⁵ 並促進所謂「西方價值」¹⁶ 的概念，其中特別是「保護民主價值」與保護西方所產生的文明社會之特殊政治文化最為重要，因為這些價值可以作為一種「具有療效的挑戰」(heilsame Herausforderung) (Rauch, 2006: 59)，讓德國在出兵行動上更加具備正當性。

大體而言，強調歷史主義與文化論的論述多半包括：過去的課題、德國與其他國家有別的獨特性，特別關心以色列與猶太人 (Martinson, 2012: 396)。同時，會從文化的角度來強化所謂的「西方

15. Kerry Longhurst 把重點放在歷史的部分，並認為統一後德國的戰略文化與西德時期差異不大，由於過去的歷史與「從零開始」(*Stunde Null*) 的經歷，使得德國戰略文化中形成「羞愧」(shame) 與「罪惡感」(guilt) 兩個重要因素，進而強調限制使用武力與避免走向民族主義。反映到政策層面，就是反對單邊主義、促進穩定、反對以戰止戰 (war-fighting strategies)、反對軍事主義、追求負責的、可計算的與可靠的安全政策，並強調市民社會的整合與追求共識 (Longhurst, 2004: 46-47)。Anja Dalgaard-Nielsen (2005) 亦是從戰略文化的角度出發，強調德國不會走向和平主義或新現實主義的方向，因為軍事干預仍然是「最後手段」，德國還是會尋求多邊主義、人道原則以及減少衝突的出兵準則 (Dalgaard-Nielsen, 2005: 357)。

16. 這些西方價值則包括對民主的承諾、人權、個人自由與不相信軍事主義，而德國對於這些價值的堅持從未改變並具連續性 (Erb, 2003: 8,220)。

價值」、文明。

三、德國在科索沃的出兵行動與論述

本文探討科索沃的出兵行動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北約「建立秩序行動」的決策，其次是「撤出部隊行動」，第三則是「盟軍空襲行動」，也就是最具爭議的行動。

(一) 科索沃出兵行動的醞釀

1. 建立秩序行動

1998 年科索沃爆發大規模的衝突，總計造成了超過 1,500 名的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的死亡與 40 萬平民流離失所 (NATO, 2007; Bjola, 2005: 282)。北約於 1998 年 10 月赫爾布魯克 (Richard Holbrooke) 調停團沒有進展後，於 10 月 9 日決議根據聯合國安理會 1160 號決議及 1199 號決議採取行動，於 10 月 13 日決定對科索沃地區進行有限的空襲行動 (begrenzte Luftoperationen)，也就是發動北約「建立秩序行動」，並將在 10 月 17 日左右，對塞爾維亞展開有限的空襲與分階段的行動 (Bundestag, 1998b: 23219)。

在德國方面，當時的「黑黃聯盟」¹⁷ 內閣則在北約決議前一天，邀集剛在選舉獲勝，並即將組成「紅綠聯盟」¹⁸ 政府的施洛德 (Gerhard Schröder) 和費雪 (Joschka Fischer) 共同討論，並決議支持

17. 所謂的黑黃聯盟所指的是「基民/基社聯盟」與自民黨所結合的聯合政府，因為基民黨的代表顏色為黑色，而自民黨的代表顏色為黃色。

18. 而紅綠聯盟所指的則是社民黨與綠黨所結合的聯合政府，因為社民黨的代表顏色為紅色，而綠黨的代表顏色為綠色。

該項提案。當時即將卸任的柯爾總理在 8 月 13 日決定參與空襲行動，並在其執政的最後一天，也就是 9 月 30 日，決定部署旋風式戰機。這項行動也獲得聯邦議會與繼任的「紅綠聯盟政府」的支持，聯邦議會在 10 月 16 日以多數通過「建立秩序行動」的出兵案 (Harnisch et al., 2004: 18-19)。

2. 撤出部隊行動

聯合國根據安理會 1203 號決議，要求塞爾維亞及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領導人及成員，充分、迅速地遵守第 1160 號和第 1199 號決議，並與科索沃查核代表團和北約科索沃空中查核團充分合作 (Security Council, 1998)，北約亦決定執行查核任務的落實，並對相關觀察員在緊急且必要的情況下協助撤離。

爲了協助撤離，1999 年 2 月 25 日開始的「撤出部隊行動」預計派出 28,000 人，在希臘與馬其頓駐守。國防部長夏平 (Rudolf Scharping) 主張德國預計貢獻 4,500 人，其中包括聯邦議會在 10 月與 11 月通過支援相關空中任務與查核任務的 1,000 人，而一旦相關非武裝的觀察員成功撤離，「撤出部隊行動」也就結束，並不會與空襲行動一起。¹⁹

3. 盟軍空襲行動

儘管進行了多項外交措施，科索沃的情勢仍然持續升高，1999 年 Racak 的屠殺事件與 Rambouillet 停火協議談判破局後，塞爾維亞軍隊對科索沃地區進行更進一步的掃蕩，造成數以萬計的難民流離

19. 這項任務的重要性在於當雙方快要達成協議時，不能讓雙方有誤解的可能性 (Bundestag, 1999b: 1701)，「撤出部隊行動」的內涵包括：(1) 查核：包括使用非武裝飛機與無人飛機進行查核，包括武裝部隊的行動、武器系統的移除、公民的自由流動、地面監控、運送人道物資等等；(2) 收集相關有效可分析的資訊；(3) 藉由北約理事會的管道，北約與歐安組織將可以分享相關的資訊 (Bundestag, 1998f)。

失所。而這樣子的作法明顯與米洛塞維奇總統於 1998 年 10 月的承諾相違背，在 1999 年 3 月 23 日美國大使赫爾布魯克調停失敗後，北約決定開始進行空襲行動，以逼迫米洛塞維奇總統簽訂協議，限制塞爾維亞政府在科索沃的控制權 (Friedrich, 2005: 85; NATO, 2007)。

德國也決定派出 500 名士兵及 14 架旋風式戰機 (包括 Electronic Combat and Reconnaissance, ECR 及 Reconnaissance, RECCE) 參與空襲行動 (Bundestag, 1999a; Friedrich, 2005: 85; Erb, 2003: 168)。空襲行動持續進行 77 天之後，由於北約與塞爾維亞政府達成「軍事-技術協議」(Military-Technical Agreement)，塞爾維亞政府決定撤兵並遵守聯合國決議接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 (KFOR) 於科索沃的駐軍後，空襲行動於 6 月 10 日暫時終止 (NATO, 2007)。

(二) 北約「建立秩序行動」的決議過程與論述

這段時間正值政黨輪替，首先是輪替前由右派的基民黨與自民黨結合之「黑黃聯盟」執政，之後才是輪替後，由「紅綠聯盟」執政。該提案由黑黃聯盟政府提出，著眼於人道危機與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Bundestag, 1998a: 2)。聯邦議會在 1998 年 10 月 16 日針對出兵問題進行辯論，最後以 503 人同意、63 人反對、18 人棄權通過該項出兵案。

1. 政黨輪替前之執政黨主要論述

基民黨的主要論述為強調人道與德國角色。國防部長魯赫 (Volker Rühe) 認為支持該項決議等於是給前線的士兵信心，同時該項任務純粹是避免人道的災難，阻止戰爭與屠殺的發生，並主張因為

德國有現代的軍隊，才會被盟邦需求 (Bundestag, 1998b: 23135)。²⁰

自民黨則強調人道、武力與國際組織的重要性，同時人道優先。外長金克爾 (Klaus Kinkel) 認為如果沒有在冬天之前解決多達 29 萬的科索沃難民問題，將會導致嚴重的人道危機 (Bundestag, 1998b: 23218)。²¹ 但是他也強調，德國雖然與 15 個國家共同通過北約的決議，但是此關係到聯合國安理會在使用武力的「壟斷權力」(Gewaltmonopol)，因此該決議不能成爲一個先例，雖然他本身也有所遲疑，但是他認為在緊急的人道狀態下，透過實踐，可以證明該項決議是正確的 (Bundestag, 1998b: 23129)。²²

2. 反對黨的立場與論述

社民黨以正當性與武力的重要性爲主要論述，並認爲不存在法律問題。即將擔任總理的施洛德主張正當性優於合法性以及德國展現軍事力量的重要性，並認爲科索沃將可以作爲出兵的前例，²³ 並認爲出兵沒有法律層面的問題。他主張出兵是根於「憲政」上的問題，而非「憲法上」的問題 (aus verfassungspolitischen nicht aus verfassungsrechtlichen Gründen) (Bundestag, 1998b: 23137)。也就是

20. 其原文為：Die NATO und auch Deutschland brauchen einsatzbereite....Wenn Wir nicht modernste Flugzeuge hätten....dann wäre es unverantwortlich, die Streitkräfte einzusetzen.

21. 他主張從波士尼亞的衝突以來，米洛塞維奇總統所擅長的就是「貓捉老鼠的遊戲」(Katz-und-Maus-Spiel)，只有透過持續維持軍事上的威脅，才有可能落實談判的內容。

22. 爲此，自民黨黨團則由格哈德 (Wolfgang Gerhardt) 補充說明因爲各國的歧見，使得聯合國安理會無法作爲，因此北約更應該反應，以避免發生更糟的情況，對當地的民眾而言，已經發生「是否能夠生存與否」的問題，德國不應該坐視不管 (Bundestag, 1998b: 23144)。

23. 他提出一個問題：「爲何對科索沃進行戰鬥任務的人道行動，而其他地方則否？」，對此問題他自己的回答是：「那是因爲過去並沒有這樣的經驗」，也因此，本次的出兵就顯得相當有意義 (Bundestag, 1998b: 23137)。

說沒有違憲的情況，只要聯邦議會能取得多數同意即可。²⁴

綠黨以人道、德國能力、案例獨特性與俄國加入為主要論述，即將擔任外交部長的費雪主要強調的部分則包括：(1) 除了重視科索沃當地人道的情況，同時強調米洛塞維奇對歐洲的威脅；(2) 展現德國的處理能力；(3) 出兵為緊急狀態；²⁵ (4) 俄國的加入 (Bundestag, 1998b: 23141)，他主張因為米洛塞維奇可能為歐洲帶來戰爭的危險，這才是決定的因素。

民社黨以反對外交政策軍事化為主要論述。代表發言的吉西 (Gregor Gysi) 則認為執政黨只是在推動外交政策軍事化，並非真的考量人道，並主張只有聯合國安理會有權力授權出兵來反駁執政黨說法，強調這次出兵並不是是否會成為先例的問題 (Bundestag, 1998b: 23146-7)。²⁶

3. 政黨輪替後之提案

隨著新的紅綠聯盟政府上任，1998年11月新選上的第14屆聯邦議會及內閣根據過去的決議提出新案 (Bundestag, 1998c)，政府提案強調政策的延續性與人道，並根據聯合國安理會1203號決議授權

24. 他認為政治解決需要有軍事力量作為後盾，並主張德國應展現給米洛塞維奇總統看的，就是德國參與國際行動的力量不會限制，而北約的軍事力量也不會限制。而在合法性的問題上，他同意如果能夠有聯合國授權是更好的，因此呼籲德國應該利用其與俄國的良好關係，促成新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以解決巴爾幹的問題。不過他也認為北約的決議也是根據聯合國安理會1199號決議所做成的，不能說完全沒有正當性，而聯邦議會中對於出兵合法性的討論，他認為並不存在這個問題 (Bundestag, 1998b: 23137)。

25. 他強調當然如果有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是較佳且明確的法律狀態，但出兵的決定也非北約的自我授權，而是緊急狀態，不會是先例，聯合國安理會仍是唯一的授權單位。

26. 他質疑阿富汗的情況並不比科索沃差，為何德國要幫助科索沃而不幫助阿富汗？他也拿費雪在1994年12月30日接受Die Woche訪問批評當時政府進行「切香腸戰術」，以擴張出兵政策的範圍，並警告德國外交政策正走向軍事化。

參與北約的「建立秩序行動」。該提案與之前提案並無不同，在政黨輪替後，新上任的外長費雪與國防部長夏平也都強調政策的延續性 (Bundestag, 1998d)，在反對黨方面，原提案的基民黨及自民黨皆表達支持的立場，只有民社黨因擔心未來的人道任務都會以軍事作為後盾而反對德軍參與北約的軍事行動。在相關立場沒有變化的情況下，聯邦議會以 540 票同意、30 票反對、12 票棄權通過該項出兵案 (Bundestag, 1998e)。

(三)「撤出部隊行動」的決策與論述

此時的「紅綠聯盟」政府強調政策的延續性，並不會因為前任政府成為在野黨之後，就反對之前的作法，因此相關出兵法案的共識度頗高。政府於 11 月 18 日提案派出約 250 名的部隊協助在緊急事件相關人員進行撤退 (Bundestag, 1998f)。這次行動爭議不大，在 11 月 18 日的聯邦議會中只進行了 45 分鐘的辯論就通過，最後，聯邦議會以 555 票贊成、36 票反對、7 票棄權的多數同意派遣部隊 (Bundestag, 1998g: 433; Schröder, 2005: 85)。

1. 執政黨的主要論述

社民黨以國際組織決議與參與人數不多為主要論述。社民黨的國防部長夏平主要訴求為國際組織以及德國參與人數不多。他主張北約已經在 11 月 13 日通過決議，這項出兵行動是在北約、聯合國與歐安組織的決議基礎上進行的，德國雖然承諾 250 人參與，但實際上計畫中只有 190 人，因為法國作為任務的領導國家，承擔了多數的任務，不過德國基本上還是準備好負擔更多義務的 (Bundestag, 1998g: 424-425)。

綠黨以國際組織決議與獨特性為主要論述。綠黨的外交部長費

雪強調國際組織與緊急狀況的獨特性。他認為空中監測等部分是聯邦議會已經授權的，而此案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於緊急情況上的授權 (Notfallmaßnahme)，²⁷ 而他主張德國應該要有勇氣對最後的軍事手段表達肯定與多數支持之意 (Bundestag, 1998g: 422)。綠黨黨團代表並主張這次行動的獨特性，與過去政府推動「外交政策的軍事化」不同，是不同的道路 (Bundestag, 1998g: 426)。

2. 反對黨的主要論述

基民黨與過去相同，強調戰略上用軍事武力促進決議達成的關連性。雖然他們認為介入的時間點已經太晚，因為在 10 月份就已經造成超過 30 萬的難民，而在難民之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家園是全毀，三分之一半毀，只有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就算回去還勉強有房子可居住。不過，爲了要促進相關決議能夠順利實行，只有維持一定的軍事威脅才能達成，因此基民黨還是支持的 (Bundestag, 1998g: 429)。

自民黨主張政策連續性與其他國家行爲。因為「撤出部隊行動」是在馬其頓駐守的多國部隊，是許多國家加入的，過去「黑黃聯盟」執政時便已支持相關出兵任務，現在作爲過去的反對黨的社民黨與綠黨執政，支持過去他們反對的政策，自民黨基本上是表示歡迎且認為是正確的 (Bundestag, 1998g: 425-426)。

民社黨強調反戰傳統。作爲唯一反對的政黨，民社黨的理由是德國長期反戰，但本次行動並非執政黨所說的非軍事行動。他們認為「撤出部隊行動」不一定能夠提供保護，反而可能增加風險，出兵行動帶有威脅的意味，透過權力強迫他人接受的手段，便不完全

27. 所謂的緊急情況，他認為是在加速協助非武裝的歐安組織觀察員撤退時，當其面臨到可能會危及生命與健康的緊急情況所採取的作為 (Bundestag, 1998g: 422)。

是非軍事手段，因此民社黨對出兵行動是反對的 (Bundestag, 1998g: 427)。

(四) 盟軍空襲行動的決策與論述

1. 執政聯盟的主張與論述

對於德國的執政者而言，既然之前都已經同意了北約「建立秩序行動」，實在沒有反對科索沃「盟軍空襲行動」的理由，但由於行動本身有爭議性，社民黨本次主要論述非常全面，涉及歷史、國際組織、其他國家重要性、責任、人道、過去決議與西方價值。施洛德總理在 3 月 26 日的報告中主要論述包括歷史、北約與戰略上俄國的重要性。他從歷史的角度出發，表示此次決定的困難，並強調各國尋求和平的手段已經進行很久了，出兵是最後的選擇，同時俄國的參與以及歐盟與俄國的關係仍很重要 (Bundestag, 2002b: 2571-3)。

社民黨的國防部長夏平主張責任、人道、歐洲觀點的重要性，並提到過去的決議基礎。他花了很多時間強調「責任」，包括幫助難民、協助巴爾幹給予歐洲觀點，包括文明、法治等概念，²⁸ 他並強調結束軍事行動為塞爾維亞當局的責任 (Bundestag, 2002a: 2424)。

綠黨的主要論述則為制度、武力與俄國的重要性。外交部長費

28. 他並認為這些行動不僅是對過去的責任，也是對未來的責任，而這也是根據聯合國安理會 1199 號決議與聯邦議會過去在 1998 年 10 月 16 日的決議基礎上所進行。同時，如果現在沒有辦法制止這樣的暴行，那對於其他的區域也會有同樣的效果與風險，他並強調德國對於其周邊國家有責任，並強調議會應該給予士兵與士兵的家人信心，表示其行動是合法被支持的 (Bundestag, 2002a: 2429)。

雪的主要論述包括：聯合國、歐盟、武力與俄國的重要性，並強調協助當地難民的回流、促使塞爾維亞當局放棄使用武力等 (Bundestag, 2002b: 25/3-6)。爲了讓美國持續介入歐洲的安全事務，應該要讓北約持續扮演角色，但是，他也同時強調，對科索沃的戰爭並不能視爲是允許北約在外來衝突介入的先例，而只是一個「非常大的特例」(very, very large exception) (Wagnsson, 2008: 34)。

2. 反對黨的主張與論述

基民黨的主要論述強調人道與制度。基民黨則由朔伊布勒 (Wolfgang Schäuble) 代表發言，其論述與過去 10 月出兵案時相同，強調人道與制度之重要性。基民黨立場爲支持紅綠聯盟政府的政策，並認爲北約的攻擊行動是阻止屠殺的作法，並強調不能對盟邦拒絕 (Bundestag, 2002a: 2425)。²⁹

自民黨的主要論述強調人道、和平與人權。自民黨黨團由格哈德發言表示希望透過行動使科索沃地區人民能夠被「人性化的對待」(menschlich behandelt zu werden) (Bundestag, 2002a: 2425)。自由民主也是會面臨要使用最後手段的一刻，這是多年來所討論的，現在北約面臨的不是戰爭的目標 (Kriegsziel)，而是自由社會要怎麼對待人類的生命受到威脅的問題，對其而言，空襲任務並不是攻擊性的，也沒有敵意，只是一種國際的保證，對於人權的堅持，歐洲對於人權尊重的傳統文化才是行動的核心 (Bundestag, 2002b: 2426-7)。

民主社會主義黨的主要論述仍爲反戰與相關法律的重要性。民社黨認爲空襲行動違反了國際法與憲法，他認爲透過炸彈無法解決

29. 該處原文爲：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s – ich hoffe – ganzen Parlaments können sich vor allen Dingen die Soldaten der Bundeswehr und die Soldaten der Streitkräfte unserer Verbündeten im atlantischen Bündnis verlassen.

災難，反而增進災難 (Bundestag, 2002a: 2422-2426)，同時民社黨也強調應該將俄國拉回同一艘船，畢竟俄國隨時可以將情勢複雜化，同時強調尊重聯合國安理會的共同決議，而非只有北約單獨行動 (Bundestag, 2002b: 2589)。³⁰

四、德國在阿富汗的出兵行動與論述

探討阿富汗的出兵行動與論述可以分為幾個階段進行，首先是「國際安全援助部隊」的確立，接下來則分別有幾次的延長任務，本文因篇幅有限，原則上以 2001 年至 2006 年這段期間作為分析的內容，³¹ 雖然之後 2009 年的選舉結果促成了基民、基社聯盟與自民黨的「黑黃聯盟」政府的成立，但因篇幅有限，且 2001 年至 2006 年的相關延長案之討論，加上上一段對於科索沃之案例分析，已經跨越兩次政黨輪替，足以對於相關政黨論述的轉變進行完整的分析與比較。

(一)「國際安全援助部隊」任務的確立與主要論述

針對「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提案，聯邦議會以 538 票贊成、35

30. 該處原文為: Wir müssen Rußland wieder in das Boot nehmen, Rußland war bereit, den Druck zu verschärfen.

31. 在 2001 年至 2002 年 9 月這段期間，也就是國際安全援助部隊任務確立與第一次延長任務的決策過程為紅綠聯盟政府執政，反對黨則包括基民、基社聯盟、自民黨與民社黨，但在 2002 年 9 月聯邦議會選舉後，民社黨未能取得成立黨團之席次，因此從 2002 年至 2005 年 9 月的第二次延長案至第五次延長案的討論，雖仍為紅綠聯盟政府執政，但反對黨僅剩下基民、基社聯盟與自民黨。2005 年至 2009 年執政聯盟則更迭為由基民、基社聯盟與社民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反對黨則包括綠黨、自民黨與左翼黨 (Die LINKE)。

票反對、8 票棄權通過該出兵案，以下分從任務的醞釀以及各黨派主要論述進行探討。

1. 任務的醞釀

隨著美國攻打阿富汗的戰事告一個段落，各國代表於 2001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5 日，在波昂舉行了阿富汗的重建會議，會議由聯合國召集阿富汗各派政治勢力共 32 名代表出席會議，其他還有聯合國代表團、五個常任理事國、巴基斯坦和伊朗等鄰國、歐盟、日本、加拿大、土耳其、印度等共 19 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共同參與。而根據會議結果，聯合國安理會並通過第 1386 號決議成立「國際安全援助部隊」，並於 2001 年 12 月 20 日正式成立 (Löflmann, 2008: 17)，根據 2001 年 12 月 21 日的德國政府提案，決議派出 1,200 人參與為期六個月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 (Wölfle, 2005: 93)。聯邦議會在 2001 年 12 月 22 日的院會通過該項「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的出兵案。

2. 執政聯盟的主張與論述

社民黨的施洛德總理的論述核心為盟邦與制度。他表示：「『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是一個政治決定，也是我過去表示對盟邦一致性團結亦包括軍事工具等說法的結果」，他並強調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對德國而言是很重要的，而完全的參與（亦即包括軍事行動）是對盟邦團結的表現 (Bundestag, 2001b: 20822-3)。

綠黨外長費雪除強調聯合國與人道之外，也強調與歐洲的關係。他重申「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是人道救援行動，也是聯合國所授權的行動；德國參與阿富汗的行動，除了與阿富汗的關係之外，還有整體歐洲的考量，也因此德國要與荷蘭及丹麥等國共組聯軍 (Bundestag, 2001b: 20827)。

3. 在野黨的主張與論述

基民黨強調歐盟與歐洲三個主要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及德國）的角色，認為三國應該先有共同立場，並認為德國應該思考扮演領導國的問題（Bundestag, 2001b: 20824）。³²

自民黨的主要論述為國際組織、盟邦的角色，但反對德國扮演領導國角色，該黨團表達幾項關心的重點：（1）本次任務為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德國應該參與；（2）與重要盟邦美國的密切關係；（3）北約存在與主導任務的重要性；（4）德國軍隊在後勤與運輸工具上仍然缺乏，需要更多財政支援；（5）德國不應扮演領導國角色（Bundestag, 2001b: 20828-9）。

民社黨強調反戰，強調國際組織授權的重要性，並強調其他國家的行為不明確。黨團代表克勞斯（Roland Claus）則表示，該黨團不反對聯合國授權的重要性，但是民社黨認為這項任務還是有戰爭的本質，雖然各黨都強調任務的分隔，但是在提案中看不出來有這樣的分隔，因此民社黨仍然維持其一向主張「以戰止戰是錯誤作法」的立場，同時，他們認為聯合國的授權也不夠清楚，在美英兩國與德法兩國意見不甚相同且包括任務的時間與範圍都不是很明確規範的情況下，民社黨仍反對出兵（Bundestag, 2001b: 20830）。

32. Friedrich Merz 代表基民黨黨團發言指出：「美國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略是正確的，而在今日的聯邦議會中，其實只有民社黨黨團反對出兵。重建是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國際的協助，但是『基民/基社聯盟』黨團的困難處，在於歐洲的三個主要國家，也就是英國、法國及德國，對於共同歐洲外交及安全政策與三國在聯合國內部的立場，似乎都沒有達到最後一致的結論。同時，歐盟在阿富汗問題上也沒有扮演適當角色，雖然今天並非討論歐洲共同政策的時刻，但是黨團仍表達對此的關心。同時，黨團也認為德國仍要思考未來是否扮演領導國？對於與美國領導的行動，未來該如何協調等問題」（Bundestag, 2001b: 20824）。

(二) 第一次延長任務（2002 年 6 月至 12 月）的聯邦議會辯論

政府在 2002 年 6 月 6 日提案 (Bundestag, 2002c)，表示根據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及 2001 年 12 月 22 日通過的出兵案 (Bundestag, 2001a)，德國將該「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出兵案提議延長半年。聯邦議會於 2002 年 6 月 14 日進行討論，很短時間便以 517 人贊成、34 人反對、5 票棄權，絕對的多數通過該議案。

1. 執政聯盟的主要論述

社民黨的國防部長夏平報告強調過去成效與武力維持的重要性。他認為各國在阿富汗的工作卓著，婦女的保障也獲得成效，但是這些成效仍是不穩定的，仍需要協助；德國過去協助舉辦波昂會議、也在歐盟及國際社會的架構下做出經濟上的重建援助，根據出兵案的設計，德國預計派出上限為 1,200 人的士兵，同時，國際上也同意軍事應該作為最後的手段，但是適度的軍事維持該區域的穩定仍有必要，他並呼籲聯邦議會應該用多數通過來對阿富汗人民表示支持 (Bundestag, 2002d: 24464-6)。

綠黨的外交部長費雪除了強調過去的成果之外，並認為如果德軍撤出將可能導致當地內戰再起，並造成人道災難，並強調國際社會共同決定的重要性與聯合國部隊的重要性 (Bundestag, 2002d: 24474-5)。綠黨黨團也強調國際介入的成果，並引用聯合國與報紙報導說明德國在喀布爾領導的重要性，同時，綠黨也強調聯合國對於當地和平與穩定的發展之重要性 (Bundestag, 2002d: 24472)。

2. 在野黨的主要論述

基民黨強調外交與軍事並行的重要性，他並強調國際上在當地的成果（包括選舉、學校重建、婦女地位、難民回流等），並強調此為人道行動，他並強調外交與內政的連結性（Bundestag, 2002d: 24468-71）。

自民黨團認為此任務是在國際組織的領導下，為了保障當地的民主本質（demokratische Elemente）所進行，自民黨當然應該支持（Bundestag, 2002d: 24472-3）。

民社黨認為不應該從頭就認為軍事武力的重要性，應該還有其他的道路，這正是德國的責任與傳統（Bundestag, 2002d: 24474）。

（三）第二次延長（2002年12月至2003年11月）

2002年12月3日德國政府提案延長「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一年的授權，並表示願意與荷蘭共同擔任「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領導國的地位。在這個提案中，執政聯盟要求聯邦議會授權派出2,500名的士兵，共計花費4億960萬歐元的預算（Bundestag, 2002e: 223）。雖然各黨對於士兵的風險有些爭議，但是整體方向都是支持延長案，因此，最後還是以565票贊成、9票反對、2票棄權通過該項提案（Bundestag, 2002f: 1325-1332）。

1. 執政聯盟的主要論述

社民黨的主要論述為歷史、德國利益與角色以及戰略環境的改變。當時國防部長史圖克（Peter Struck）認為應該通過延長案的理由包括：（1）歷史的教訓：從波士尼亞、科索沃等事件來看，只有用錢是無法解決問題的，仍需要軍事的存在；（2）擔任領導角色鼓舞士兵；（3）德國的利益：德國的安全與利益也包括在興都庫什地

區；（4）全球安全政治的改變：現代的安全政治已經跨越疆界，同時德國軍隊也要進行改革，將朝向危機處理、協助重建與協助國家建立的方向（Bundestag, 2002f: 1314-5）。較值得注意的是，之前都沒有提及所謂的利益的問題，但是這次卻開始主張德國的利益問題。

綠黨的主要論述則強調聯合國的角色、反恐與協助當地建立制度與正常國家。外長費雪對此表示，當地的情勢當然是充滿危險的，但是聯邦議會應該要用具體的行動來支持在當地服務的德國士兵，他認為持續在阿富汗地區對抗恐怖主義是有必要的，並強調不僅要從軍事、警察、秘密任務著手，並拔除所有恐怖分子的網絡，同時，也要協助當地建立正常國家。他指出雖然士兵有風險，但是因為這是聯合國的任務，因此，這也是無可卸責的責任（Bundestag, 2002f: 1321）。

2. 反對黨的論述

基民黨主張戰略上應維持該區域穩定與當地士兵安全的重要性。基民黨黨團表示若不能帶給該區域穩定，將可能會反過來影響本土安全，但是基民黨相當關心士兵的安全，他指出，史圖克在委員會討論過程中曾保證士兵是在相對安全的區域，但是在 12 月 19 日接受柏林日報（Berliner Zeitung）訪問的時候，卻主張該區域是相當不穩定並具有危險的，因此基民黨黨團要求應該有緊急狀態的撤離計畫（Bundestag, 2002f: 1317）。

自民黨以人道與責任為主要論述。自民黨黨團表示因為喀布爾的情勢仍然嚴峻，且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人被地雷所傷，因此德國的責任非常重大，基於人道理由自民黨黨團同意該項延長案（Bundestag, 2002f: 1319）。

(四) 第三次延長 (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10 月)

第三次延長案本身涉及到任務是否擴大範圍的爭議，2003 年開始針對在阿富汗的任務是否擴大的討論，2003 年 10 月 15 日，內閣通過「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的延長案，並同意擴大到大喀布爾地區，同時也將擴大到東北邊的 Kunduz 區域，而德軍在 Kunduz 的任務預計先派出 40 至 70 名的士兵前往，並將在 2004 年初開始部署約 230 人至 450 人的士兵，這些先鋒部隊便是確保重建團隊的安全 (Bundesregierung, 2003)。由於與之前議案不同，因此在辯論過程中較多爭議，最後，聯邦議會在只有自民黨反對的情況以 531 票贊成、57 票反對、5 票棄權授權延長。

1. 執政聯盟的主要論述

社民黨的主要論述為現有制度的成效與任務的安全性，國防部長史圖克表示：「德軍在阿富汗並非佔領軍，只是穿著制服的協助者 (Helfer in Uniform)」，因為過去「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在喀布爾工作的成功，³³ 國際社會希望能夠將成功經驗擴展。他也強調，德軍將前往的並不是每天都會有危險的區域，德軍的工作主要是巡邏的工作，同時也不會從事打擊毒品的工作 (Bundestag, 2003: 5989-90)。

綠黨則強調聯合國與阿富汗政府的要求，並主張本次的部署既不是軍事性的，同時也不是德國單獨出兵，是在阿富汗整體重建網絡下的一部份，也是聯合國及阿富汗政府共同要求下的行動，因此綠黨沒有反對的道理 (Bundestag, 2003: 5993-4)。外交部長費雪也保證，一旦該項任務發生風險時，北約軍隊及美國軍隊都會在最短的

33. 也就是所謂的「『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之島」(ISAF Insel)。

時間內協助撤離，將可將風險降到最低 (Bundestag, 2003: 6000)。³⁴

2. 反對黨的主張與發展

基民黨的主要論述為德國應該與其他國家合作，維持該地區穩定。對於仍有風險的出兵，該黨團仍表示擔心，雖然支持該項提案，但是那是因為不想要看到阿富汗再回到不穩定的狀態，而讓恐怖份子得利，但是他要求政府應該與國際合作，探討如何對抗當地軍閥以及嚴重的毒品問題 (Bundestag, 2003: 5990-3)。

自民黨的主要論述從其他國家的行為探討歐洲應有共同的政策。該黨團反對該項提案，認為這項任務既非屬重建，也非屬反恐，並呼籲歐洲應該形成共同的歐洲外交政策。畢竟這次任務歐洲部分除了英國之外，沒有其他國家參與，再加上該項任務仍有風險，因此自民黨反對該項任務，不過他也強調他們尊重民主的多數 (Bundestag, 2003: 5994-6)。

(五) 第四次延長 (2004 年 10 月至 2005 年 10 月)

2004 年 9 月 17 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 1563 號決議，強調將中央政府的權力擴展到阿富汗所有地區，歡迎北約進一步協助成立省級重建隊 (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 Team, PRT)，並歡迎「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和「持久自由行動」隨時準備協助確保全國選舉的舉行順利，由於阿富汗情勢對國際社會仍有威脅，因此決定將「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的授權，自 2004 年 10 月 13 日起，延長 12 個月 (Security Council, 2004)。

34. 費雪並揶揄反對該項延長案的自民黨，他指出過去自民黨在德國擔任重要的外交工作，強調聯合國決議的重要性，現在有聯合國決議，自民黨反而反對？ (Bundestag, 2003: 6000)

第四次延長案的重點在於當地情勢使得德軍面臨風險，同時，也因為當地的可能風險，使德國的政治菁英面臨是否要擴大任務至其他不安全的地區之疑慮，最後還是在自民黨反對而朝野兩大政黨贊成的情況下，以 509 票贊成、48 票反對、3 票棄權通過該案 (Bundestag, 2004: 11759)

1. 執政聯盟的主要論述

社民黨的主要論述強調任務的獨特性與對民主的意義。國防部長史圖克表示這次的延長不應該視為是常規性的延長 (nicht als Routine ansehen sollten)，因為他是一個會有危險的任務，不過士兵們都知道參與任務的危險，也知道任務對於促進阿富汗民主自由(包括促成了 48% 女性的投票權) 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希望聯邦議會能夠支持 (Bundestag, 2004: 11746-7)。³⁵

綠黨的主要論述，外長費雪強調各國的努力，特別是「彼得斯堡協議」與聯合國，促成了阿富汗的總統選舉與各地的民主，他也提到目前阿富汗還有許多軍閥與毒品的問題仍待進一步解決，同時警力、中央權力與當地經濟的重建也是重點，而這些計畫要能夠實現，只有德國參與才有可能 (Bundestag, 2004: 11751-2)。

2. 反對黨的主要論述

基民黨的主要論述包括恐怖主義的威脅與士兵安全。基民黨黨團表示恐怖主義對德國的威脅越來越大，因此，該黨團認為在阿富汗的行動是正確與重要的，可以遏阻塔利班以及恐怖份子的再起。

不過，他們也強調作為反對黨，必須提醒政府注意在阿富汗毒

35. 蓋因延長案討論的前一天，在阿富汗發生了攻擊事件，包括 3 名德國士兵與 2 名瑞士士兵受傷，以及一名上士 (Oberfeldwebel) 重傷，因此，各黨皆關心士兵於當地活動之安全性。

品氾濫的嚴重問題，以及如何確保德軍在 Faizabad 的安全，特別是根據「德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Deutschland) 的報導指出，當地的首長建議德軍在城外駐紮，以避免士兵與當地婦女接觸，都顯示該地居民不若喀布爾區域來的友善 (Bundestag, 2004: 11748)。

自民黨的主要論述為外交傳統與歐洲其他國家是否有共同的作為。黨團只同意在喀布爾的任務，不同意在 Kunduz 省的任務，因此從一年前就開始反對擴大任務，此時也不會改變，自民黨提出德國過去自由的外交政策傳統 (Tradition liberaler Außenpolitik) 就是嵌入 (einbetten) 在歐洲當中，因此要探討的是歐洲國家是否有一致的概念，他指出在德國省級重建隊的旁邊為英國與荷蘭的省級重建隊，但是他們都是隸屬在「持久自由行動」之中，但德國沒有，所以士兵常常面臨要參與危險與保持距離的問題當中 (Bundestag, 2004: 11750-1)。

(六) 第五次延長 (2005 年 10 月至 2006 年 10 月)

德國內閣在 2005 年 9 月 21 日為因應 2005 年 9 月 13 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 1623 號決議，而提出延長案的政府提案 (Bundestag, 2005a)。該項議案在 9 月 28 日於聯邦議會進行討論，第五次延長案遇到的阻力較小，自民黨不再全黨反對延長案，而採取開放的立場，因此該延長案自然在朝野政黨均無太多反對的情況下以壓倒性的 535 票贊成、14 票反對、4 票棄權通過該項議案過關。

1. 執政聯盟的主要論述

社民黨的主要論述為法律基礎、和平、阿富汗情勢與其要求德國持續參與。其政府提案主張參與延長任務具備國際法上與憲法上的基礎 (Bundestag, 2005a)，同時，國防部長史圖克指出在阿富汗任

務的辛苦與危險，從 2001 年至 2005 年為止，已經有 17 名士兵死亡、22 名士兵在自殺攻擊中受到重傷。但是在各國的努力下，隨著阿富汗新國會的建立，也使得波昂協議獲得執行，德國也即將在柏林舉行後續的阿富汗會議。而沒有「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的任務，這些成果將無法達成，而「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任務也證明其並非戰爭，而是和平的任務，同時，當地政府也都表達德國持續參與的重要性 (Bundestag, 2005b: 17574)。

綠黨由外交部長費雪發言，其主要論述包括國際組織的重要性（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過去波昂協議的成果等）、德國做為區域領導以及與英國、義大利等國合作的重要性、歷史責任、當地情勢（重建的需要、毒品的氾濫與危機的彈性反應）以及世界和平等 (Bundestag, 2005b: 17576-7)。

2. 反對黨的主張與發展

基民黨的主要論述包括反恐、民主、制度與德國利益。該黨團支持提案，支持的理由包括：（1）避免塔利班及恐怖主義的回流；（2）重建與促進民主化與穩定的過程尚未完成；（3）毒品的危害也會影響德國青少年的健康；（4）在聯合國及北約的多邊架構下合作；（5）符合德國利益 (Bundestag, 2005b: 17575)。

自民黨的主要論述為國際組織決議、憲法判決與國際合作。其黨團代表表示表示，自民黨只反對擴大任務，並不反對任務本身。而這次的任務基本上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要求下，並且符合 1994 年憲法法庭的判決所進行，並與 35 個國家與相關人道組織共同合作，共同維護當地安全與打擊毒品，因此，自民黨採取開放投票，但多數會支持政府提案 (Bundestag, 2005b: 17577-9)。

(七) 政黨輪替與第六次延長 (2006 年 10 月及旋風式飛機一案)

選後的「大聯合內閣」因應聯合國安理會第 1707 號決議，於 2006 年 9 月 13 日提出延長出兵案 (Bundestag, 2006a)，但是因為「左翼黨」在聯邦議會選舉上取得成果，並成立黨團，因此聯邦議會中的反對聲浪提高，³⁶ 最後，該延長案在只有左翼黨及各黨少數成員反對的情況下，以 492 票贊成、71 票反對、9 票棄權過關。

2006 年 10 月北約要求德國提供具有偵察能力的旋風式戰機參與「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任務，以取代英國 Harrier 戰機撤離的空隙 (Operation Achilles) (Löflmann, 2008: 37)，2007 年 2 月 7 日，政府提案至 2007 年 10 月 13 日為止，在「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任務的全區中，派出約 500 名人員參與執行相關監控與偵察的任務 (Bundestag, 2007a)。最後，在國際的壓力、大聯合內閣支持，但左翼黨及各黨內部皆有少數議員反對的情況之下，以 405 票贊成、157 票反對、11 票棄權通過該項出兵案 (Bundestag, 2007c: 8712)，授權同意派遣旋風式戰機與 500 名人員參與任務，而與之前最大的不同是，任務將以全阿富汗為範圍，而該任務直接隸屬在喀布爾的總部，由北約指揮 (Löflmann, 2008: 38)。

1. 執政聯盟的主要論述

基民黨在延長案上的主要論述為強調制度、民主制度的促成與

36. 反對黨「左翼黨」也提出對應提案，表示阿富汗的武裝攻擊案件頻繁，同時，政府在撤離上沒有備案、在行動區域上不斷擴大，同時阿富汗中央政府包括在內部控制、毒品管制上等，都顯示其無法掌控當地情勢，表示「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的任務並沒有成功，因此，該黨團要求政府應該有明確的撤退備案，並對任務的時間限制有所說明 (Bundestag, 2006c)。

德國的能力與獨特性（駐守在北部）。³⁷ 另外，在參與旋風式戰機的部署上的主要論述則包括制度與德國的物質能力。具體主張包括：（1）德國參與北約的決策過程，有責任出兵；（2）德國的旋風式戰機有能力處理偵察的問題，包括在較差的天氣下，亦能夠在 8.5 公里以上的高空從事偵察；（3）「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與「持久自由行動」都是聯合國授權的任務，符合國際法；（4）重建工作需要安全的確保（Bundestag, 2007b: 8130-1）。

社民黨在延長案上的主要論述為各國在制度上的努力與過去的歷史。³⁸ 在旋風式戰機一案，其主要論述大致相同，仍是強調制度的要求與團結，不過為了擴展任務至南方，當時外長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表示，在德國的努力之下，北部情勢是有改善的，但是阿富汗南部的情況仍持續惡化，為了避免塔利班的勢力復甦，德國有能力且有必要介入，此舉也是德國支持「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與北約的展現（Bundestag, 2007b: 8127-9）。³⁹

2. 反對黨的主要論述

自民黨的主要論述為擔心當地情勢的改變，但基於協助當地「國家建立」與民主制度的建立的立場上，支持該項延長案（Bundestag,

37. 當時國防部長勇格（Franz Josef Jung）表示，在國際的協助之下，阿富汗當地已經完成選舉與制憲的民主過程，而德國的持續參與，對於「網絡型安全政策」（vernetzten Sicherheitspolitik）的實現是很重要的。同時，德國也仍然會駐守在北邊及喀布爾，這在未來也不會改變（Bundestag, 2006b: 4974-5）。

38. 施泰因邁爾提醒大家回憶，過去阿富汗在塔利班執政時代作為全球恐怖份子訓練中心，同時也強調從彼得斯堡會議以來德國以及各國的努力，包括在政治上、警力上及各方面的重建（Bundestag, 2006d: 5208-9）。

39. 聯邦議會中有許多議員擔心會逐步走向無法控制的軍事化情況，他則保證這些作為都是在重建的政治策略下，也是為了阻止恐怖主義。

2006d: 5209-10)。⁴⁰ 在旋風式戰機一案上，自民黨的基本論述則為歐洲的文化傳統與人道考量。其黨團代表指出，對於出兵，自民黨黨團根據歐洲的文化傳統，還是多半傾向說「不」(Bundestag, 2007b: 8130)，不過，在3月9日時，自民黨黨團還是決定多數支持該項提案，因為他們認為在阿富汗的重建工作仍有必要性，他們是站在人道的考量上支持的 (Bundestag, 2007c: 8691)。

綠黨在延長案上的主要論述則是擔心區域情勢會不穩定，其黨團代表指出，從「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撤兵將會使阿富汗變成伊拉克化，回復動亂的情勢，因此還是同意延長任務的提案 (Bundestag, 2006d: 5215)。在旋風式戰機一案，綠黨的主要論述則是著重在政府戰略上是否有所轉變以及重建的成果。其黨團代表表示，綠黨同意該項出兵案，但是反對派兵到南部，同時他們也希望執政聯盟要說清楚，派出旋風式戰機是否為其戰略轉變的藉口 (Bundestag, 2007b: 8134)。

左翼黨在延長案時的主要論述為目前的制度對於重建是失敗的，⁴¹ 應該將多數經費用在重建而非軍事，同時不應該試圖去翻轉

40. 該黨團指出，過去在照片中常見當地民眾對德軍張開雙手歡迎的情勢已經改變，在北部的「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任務，也已經發展成戰鬥任務。但是德軍在包括建設學校等重建工作上都做出很大貢獻，未來仍須針對毒品的交易問題與國家建立等做出貢獻 (Bundestag, 2006d: 5209-10)。

41. 該黨團表示，每天在報紙上看到的幾乎都是當地充滿著攻擊、自殺炸彈與意外，當地的安全情況與腐敗的狀況都令人感到擔心，這種情況與執政黨當初給予左翼黨質詢時回應指出當地安全情況正在改善完全不同。過去的塔利班組織已經從伊拉克學到經驗，在阿富汗給予英國與美國的軍隊不同的攻擊，而阿富汗地區的不穩定也已經轉移至北部。從這點來看，阿富汗的重建任務並沒有達到任何的成功。同時，當地對於ISAF的支持度也大量下降，特別是在南阿富汗，他並以歷史作為驗證，過去美軍在越南、現在在伊拉克以及蘇聯在阿富汗會遭遇困難，都是因為沒有撤退的計畫，左翼黨認為，在沒有任務期限的情況下，應該否決延長案 (Bundestag, 2006d: 5213-4)。

當地的組織與制度。該黨團認為阿富汗重建失敗的原因，就是不應該在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徹底地翻轉其社會與制度，這也是過去蘇聯在阿富汗失敗的原因。該黨團表示，如果延長案只有包括教育、警察與毒品的重建任務，該黨團是沒有意見的，但是目前的延長案在阿富汗用在重建的經費每年約為 8,000 萬歐元，但卻有 4 億 6,000 萬歐元的經費是用在軍事行動上，該黨團認為這應該要反過來，將 8,000 萬歐元用於撤軍，剩下的用在重建上。

而在旋風式戰機一案，左翼黨則是從法律與國家利益的角度進行反對，該黨團認為這個出兵案不但有國際法的問題，也不符合基本法中將軍隊視為是防衛性質的軍隊的本意，同時以戰爭對抗恐怖主義，不會達到效果，因此他主張，為了國家利益，應該否決該案 (Bundestag, 2007c: 8696)。

五、綜合分析

傳統研究德國出兵政策的結論，除了本文一開始所說，呈現各說各話的情境之外，多數的結論仍是新制度主義與歷史文化論是最適合分析德國出兵政策的理論。檢證此一說法，以下將根據上述案例中各黨的論述，進而綜合分析論述與相關理論的關連性。總體而言，本文發現，有別於多數學者的看法，在本文分析的案例中，現實主義與新制度主義才是德國政治人物論述出兵時的重點。而若依照案例區分，在科索沃出兵政策上面，最常提到的論述為歷史文化與現實主義。而在阿富汗出兵政策上面，主要論述則為新制度主義與現實主義。若以執政與在野的分類方式，發現執政黨最常運用的

論述為新制度主義與歷史文化，⁴² 而在野黨最常運用的論述則為現實主義與新制度主義。

在本文所研究的 11 個案例中，以下將分為各黨論述與國際關係理論的關係、執政與在野以及案例別三個面向來探討，並試圖與 Martinson (2012) 的結論進行比較。⁴³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相關案例仍可分成不同的檢視方式，首先就是案例 5 至案例 10 為延長案與案例 1 至 4 及 11 屬於任務開展型的出兵案是不同的，以下也會分別檢視。其次則是極左政黨從案例 6 至案例 9 因為沒有取得黨團席次，在這段時間是沒有發言地位的，因此觀察極左政黨的走向，僅能從案例 1 到 5 及 10 至 11 進行分析。

(一) 依政黨別分類

1. 社民黨的論述傾向

社民黨在這 11 個案例中（如下表一），以新制度主義為其主要論述，其次才是歷史與文化，最後才是現實主義。而在新制度主義的論述中，其主要重點在於制度要求（特別是聯合國、北約等國際組織）與制度成效（既有制度的成果），同時前期多半講制度要求居多，而後期則多半是主張制度的成效。在現實主義論述上面，則

42. 這部分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多數結論認為新制度主義與歷史文化論是最適合分析德國出兵政策的因素，畢竟如果只看執政者的主張，確實容易有這樣的結論，但是如此的簡化卻容易忽略了政黨的輪替與政黨在執政與在野時不同的選擇。

43. 在 Martinson (2012) 的文章當中，他將各政黨的前兩個主要論述列出，發現在科索沃與阿富汗出兵上，極左政黨皆強調全體主義與制度主義、綠黨則是皆為全體主義與制度主義、社民黨皆為制度主義與全體主義、自民黨皆為制度主義與全體主義，僅有基民黨在科索沃出兵上為制度主義與全體主義，而在阿富汗出兵政策上則改為現實主義與制度主義 (2012: 400)。

為其他國家的角色，其次才是德國的角色與能力，而且可以看出越到後期，越強調德國的戰略環境、利益與能力。在歷史與文化論述上，強調歷史的教訓還是最重要的議題，其次則為責任，其他的論述則較為分散。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延長任務中，做為執政黨的社民黨幾乎是強調制度的正當性，但在其他開展出兵的任務上則未必，特別是在案例 1，當時社民黨為在野黨，並不強調制度的重要性，反而強調現實主義的論述，其他五個開展性任務中，則沒有特別顯著的結果指出社民黨偏向哪種理論論述，但可以看出其並非最大黨的時候（也就是案例 1 與案例 11），傾向採取現實主義的論述。與 Martinson (2012) 之文章相比較，⁴⁴ 本文分析結果與該文認為社民黨論述第一順位為新制度主義之結果相同，但是本文修正其不足，相關任務因開展型與延長型任務不同，論述亦有所差異。

44. 這裡可能產生的問題在於比較基準的問題，由於該文將科索沃出兵政策與阿富汗出兵政策與波灣戰爭、對伊戰爭及黎巴嫩出兵政策列為案例之一，因此，在比較基準上，其可能僅採本文之案例 3 與 4 作為分析標的，但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案例本身就有很大的變化性，因此本文得出結論係根據所有科索沃出兵中的三個案例與阿富汗的八個案例進行分析，自然會與 Martinson 的分析有所差異，本文可以將案例更加細緻化，以補充該文之看法。

表一 社民黨主要論述與國際關係理論

任務內容		SPD 的論述		
		現實主義	新制度主義	歷史與文化論
科索沃 出兵行 動	1. 建立秩序 (在野)	德國角色、 軍事力量	無	正當性
	2. 撤出部隊 (執政)	無	制度 (國際組織)	德國的義務
	3. 盟軍空襲 (執政)	其他國家 (俄國)	制度 (國際組織)	歷史、責任、人 道、西方價值
阿富汗 出兵行 動	4. ISAF 出兵案 (執政)	其他國家 (盟邦)	制度 (國際組織)	無
	5. 第一次延長 (執政)	其他國家 (盟邦)	既有制度成效	無
	6. 第二次延長 (執政)	德國利益、 德國角色、 戰略環境	無	歷史
	7. 第三次延長 (執政)	無	既有制度成效	無
	8. 第四次延長 (執政)	無	民主制度	德國獨特性
	9. 第五次延長 (執政)	無	法制結構 (國 際法、憲法)	和平任務
	10. 第六次延長 (執政)	無	既有制度成效	歷史
	11. 旋風式戰機 (與基民黨共同 執政)	德國能力	制度 (國際組織)	無

2. 基民黨的論述傾向

基民黨論述非常明顯（如表二），在所有案例中皆可以看出基民黨採取現實主義論述的說法，相對而言，新制度主義論述僅佔四個，歷史文化論述則占了五個。在現實主義論述上面，國家利益還是較少提及，主要還是強調德國本身的能力、區域穩定與其他國家的行為與武力的重要性。在新制度主義的論述上，則主要強調聯合國的功能，而在歷史文化論述上，則主要強調人道的重要性。同時，基民黨在執政的時候也與社民黨相同，較重視制度論述（幾乎集中在案例 9-11），而在開展型任務，特別是涉及較具爭議的戰鬥任務時，基民黨較易兼採歷史文化的論述，用以支撐出兵的正當性。

與 Martinson (2012) 一文相較，該文認為僅有阿富汗出兵案基民黨才將現實主義列為最優順位，而科索沃出兵政策上他認為基民黨以新制度主義為主要論述，本文的結論與之不同，基民黨傾向現實主義的主張並沒有改變過，反倒是在執政之後，才著墨在制度論述上多一些，因此，也就沒有如同該作者所說的，有發生不一致的狀況。

表二 基民黨的主要論述與國際關係理論

任務內容	CDU 的論述	現實主義	新制度主義	歷史與文化論
科索沃出兵行動	1. 建立秩序 (執政)	德國角色	無	人道
	2. 撤出部隊 (在野)	武力重要性	無	無
	3. 盟軍空襲 (在野)	其他國家 (盟邦)	無	人道
阿富汗出兵行動	4. ISAF 出兵案 (在野)	其他國家 (英、法)	無	無
	5. 第一次延長 (在野)	武力重要性	既有制度成效	人道
	6. 第二次延長 (在野)	區域穩定	無	無
	7. 第三次延長 (在野)	區域穩定	無	無
	8. 第四次延長 (在野)	反恐	無	無
	9. 第五次延長 (在野)	反恐、德國利益	制度 (UN)、民主制度	無
	10. 第六次延長 (執政)	德國能力	制度 (UN)、民主制度	獨特性
	11. 旋風式戰機 (執政)	德國能力	制度 (UN, NATO)	責任

3. 綠黨的論述傾向

綠黨以新制度主義的論述為主軸 (如表三)，其次才是現實主義與歷史文化論，而其與社民黨聯合執政期間，皆以新制度主義為主軸，直到其在野之後才放棄新制度主義的論述，改採現實主義的論述。同時，雖然綠黨傳統強調和平與反戰，但是在實際論述上卻沒有展現出來，並且越來越少談論。

至於任務本身是開展型或延長任務上，綠黨立場則沒有顯著的差異，反而是與執政或在野關連性較高。而與 Martinson (2012) 年一文相較，本文與其獲致相同結論，綠黨確實是以新制度主義為主軸，但該文並沒有注意到綠黨在野後對於現實主義論述的強化。

表三 綠黨的主要論述與國際關係理論

任務內容	綠黨的論述	現實主義	新制度主義	歷史與文化論
科索沃出兵行動	1. 建立秩序 (在野)	德國能力 其他國家 (俄國)	較弱的制度論述 (安理會，但本案例特殊)	人道
	2. 撤出部隊 (執政)	案例獨特性	國際組織決議	無
	3. 盟軍空襲 (執政)	其他國家 (俄國)、武力重要性	制度 (UN、EU)	人道
阿富汗出兵行動	4. ISAF 出兵案 (執政)	無	制度 (UN)	人道
	5. 第一次延長 (執政)	無	既有制度成效	人道
	6. 第二次延長 (執政)	無	制度 (UN)、協助當地建立制度與正常國家	無
	7. 第三次延長 (執政)	無	制度 (UN)	無
	8. 第四次延長 (執政)	無	制度 (UN、波昂協議)	無
	9. 第五次延長 (執政)	德國角色、其他國家 (英、義)	制度 (UN、波昂協議)	歷史責任、當地情勢、和平
	10. 第六次延長 (在野)	區域情勢	無	無
	11. 旋風式戰機 (在野)	戰略	無	無

4. 自民黨的論述傾向

自民黨的論述（如表四）相較於其他政黨，反而是最主張歷史與文化論述的政黨，其次才是新制度主義與現實主義。在歷史文化論述上，其以人道與責任作為論述核心，新制度主義論述則著重在國際組織與歐洲共同外交政策，現實主義論述上則以關心其他歐洲國家行為為主要論述。不過，其立場上也有改變，早期較重視歷史與文化論述，後期則轉向新制度主義論述。但是，如果是任務開展的階段（如案例 1、3、4 與 11，自民黨仍是以歷史與文化論述為主軸，這部分與 Martinson (2012) 的文章亦有明顯出入，本文研究發現歷史與文化論述並非如其所說的不具備影響角色。

表四 自民黨的主要論述與國際關係理論

FDP 的論述傾向		現實主義	新制度主義	歷史與文化論
任務內容				
科索沃出兵行動	1.建立秩序 (執政未)	武力重要性	制度 (北約)	人道
	2.撤出部隊 (在野)	多國行為	無	無
	3.盟軍空襲 (在野)	無	無	人道、和平、人權
阿富汗出兵行動	4.ISAF 出兵案 (在野)	其他國家 (盟邦)	制度 (UN)	反對擔任領導國
	5.第一次延長 (在野)	無	無	責任、傳統
	6.第二次延長 (在野)	無	無	人道、責任
	7.第三次延長 (在野)	其他國家 (英國)	制度 (歐洲共同外交政策)	無
	8.第四次延長 (在野)	其他國家 (英國、荷蘭)	制度 (共同外交政策)	外交傳統
	9.第五次延長 (在野)	無	制度 (UN 決議、憲法法庭判決)	無
	10.第六次延長 (在野)	無	民主制度的建立	無
	11.旋風式戰機 (在野)	無	無	文化傳統、人道

5. 極左政黨的論述傾向

極左政黨可分為民社黨與左翼黨兩個階段（如表五），不論是任務開展階段或者是延長階段，新制度主義的論述為其最重要的論述依據，特別是國際法、基本法與聯合國等，其次才是反戰傳統的強調。相較之下，現實主義論述是相對較少提及的，有關國家利益的說法，則是在旋風式戰機一案才首次出現，但主要仍在強調必須維護法制結構才符合德國的國家利益。這部分本文與 Martinson (2012) 因本文並未將全體主義列入分析，因此整體而言與該文的結論大致一致。

表五 極左政黨的主要論述與國際關係理論

任務內容		PDS/Linke 的 論述傾向	現實主義	新制度主義	歷史與 文化論
科索 沃出 兵行 動	1. 建立秩序 (在野)		無	制度 (UN)	無
	2. 撤出部隊 (在野)		無	無	反戰傳統
	3. 盟軍空襲 (在野)		其他國家 (俄國)	法制結構 (違反國際法與 憲法)、UN	反戰傳統
阿富 汗出 兵行 動	4. ISAF 出兵案 (在野)		無	制度 (UN)	反戰傳統
	10. 第六次延長 (在野)		無	制度 (UN)	無
	11. 旋風式戰機 (在野)		國家利益	法制結構 (法律)	無

(二) 依執政與在野分類

從執政者與在野者的政策論述來看（如圖一、圖二），⁴⁵ 也可以看出不論是哪一黨執政，執政者對於新制度主義的論述主張皆非常重視，其次才是歷史文化及現實主義的論述。依照開展型與延長型的分類來看，在任務開展階段，除了新制度主義論述一枝獨秀外，現實主義與歷史文化論述則各擅勝場，⁴⁶ 但在延長任務上，新制度主義論述仍是最主要論述，但歷史文化論述則明顯超越現實主義論述。⁴⁷

在野政黨總體而言，則以現實主義論述為主，新制度主義論述與及歷史文化論述各擅勝場，⁴⁸ 但是歷史與文化論述隨著歷史演進大幅度的銳減其重要性。任務開展階段，在野黨以現實主義為主要論述，其次則為歷史文化論述，最後才是新制度主義論述。⁴⁹ 但是在延長任務時，現實主義仍為主論述，其次為新制度主義論述，最後才是歷史文化論述。⁵⁰

45. 這裡著重在政黨於執政與在野是否有共通性，因此不計算政黨輪替與否的問題。計算方式採累計的方式，當案例之中有提到相關論述則計1分，反之則為0分。

46. 新制度主義論述共9次，現實主義與歷史文化論述各7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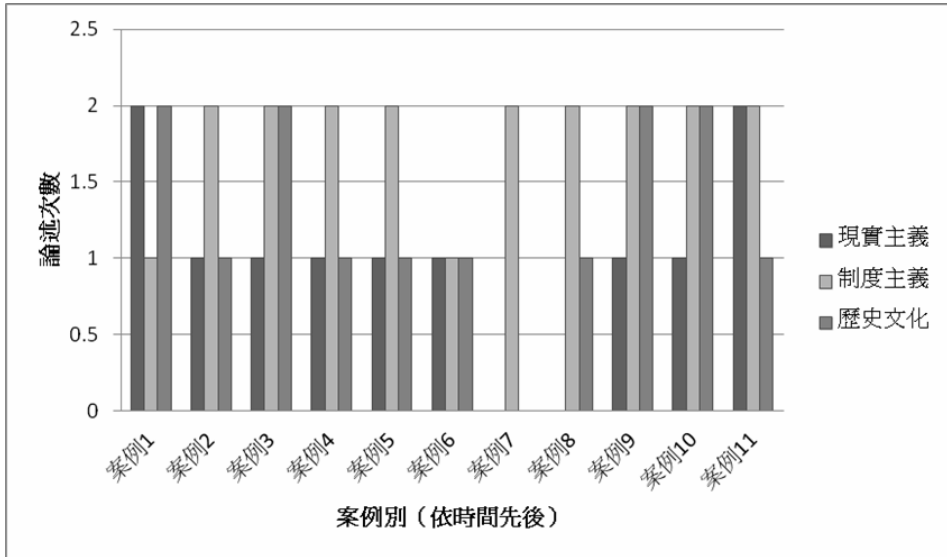
47. 新制度主義論述11次，歷史文化論述7次，現實主義論述4次。

48. 現實主義論述18次，新制度主義論述與及歷史文化論述各13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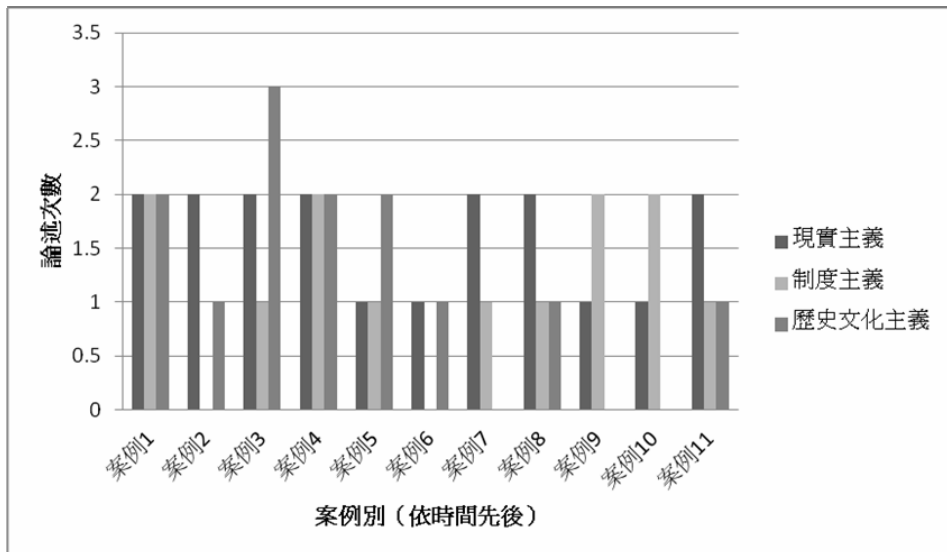
49. 現實主義論述10次，歷史文化論述9次，新制度主義論述6次。

50. 現實主義論述8次，新制度主義論述7次，歷史文化論述4次。

圖一 執政黨的政策取向



圖二 在野黨的政策取向



(三) 依案例別

最後，如前所述，本文在結論上有許多與 Martinson (2012) 將所有政治人物之論述集合而成所獲致的結論有所差異，主要原因為其將科索沃與阿富汗出兵視為單一事件，而本文則細部將其細分為不同的階段，如果將各個階段合起來計算，與各階段分別檢視，將會有不同的結果。本文試著將各政黨的論述總和，發現在科索沃出兵政策上面，德國的政治人物最常提到的論述為歷史文化論述與現實主義論述(各為 11 次)，最後才是新制度主義論述(被提到 8 次)。而在阿富汗出兵政策上面，德國政治人物最常提到的為新制度主義論述(被提到 23 次)，其次為現實主義論述(19 次)，最後才是歷史文化論述(17 次)。

六、結 論

根據上述相關論述，整理各黨各階段論述與國際關係理論之關聯如下圖三。如本文一開始所說，不同理論的學者均主張其理論的有效性，而在相關文獻中，認為解釋德國出兵政策，也以主張新制度主義與歷史文化論者居多數，甚至有學者指出，主張現實主義的學者多半不是研究德國的學者或者並非德國人，認為研究德國安全政策應該從歷史、經濟、地理甚至是文化與規範因素來分析，並強調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文化因素與可能的政策選項，德國的認同並不是追求國家利益，而是藉由合作促進西方價值 (Erb, 2003: 8, 15, 220; Lantis, 2002: 40)。⁵¹

51. 這樣子的說法雖然強調研究德國應該探討各種不同的根源，但主要還是以歷史及文化論為主。

爲了避免又落入各說各話，本文一開始便援引Jeffery D. Martinson (2012) 的作法進行分析與檢討。不過，根據Martinson (2012) 的結論指出，他發現新制度主義與全體主義⁵² 爲德國政治人物最常進行的論述，而現實主義是越到後期越扮演角色，至於歷史主義基本上在德國決策過程中所佔的比例已經越來越少。

但從本文的研究可以顯示，新制度主義一如多數學者所主張的，在相關論述上確實是最常被提及的，其次才是現實主義，相對而言，歷史文化論的主張確實是在論述上較少提及。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種現象，也就是在任務開展的時候，現實主義反而是最重要的論述，其次才是新制度主義與歷史文化論。從圖三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我們將延長案的相關案例去除（僅剩下案例 1 至 4 與 11），反而是多數的黨派都提到現實主義的論述，⁵³ 由此可見，當任務在開展的時候，固然制度與歷史文化等因素仍是政治人物考量的重點，但是現實主義的論述，包括區域的穩定、其他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俄國）的看法，德國政治人物關心的程度甚至超越原先所強調的制度與文化等因素。

這部分與當初出兵政策整體走向實質干預，但政治人物受到歷史文化因素影響，仍存在著「避戰」的觀念有關。從出兵的內涵上來看，在北約「建立秩序行動」時，德國仍強調以文官爲主，就算派出部隊，亦以海空部隊爲主，陸軍方面主要則爲醫療及運輸之用；到了「鷹眼行動」以及「撤出部隊行動」，在「鷹眼行動」純粹以空軍配合極少數的高級文官爲主體，而「撤出部隊行動」的任務除了支援查核任務外，還要擔負可能的撤離行動，因此，增加了所謂

52. 他所謂的全體主義，所指涉的乃強調公益、世界和平與和諧的層面，而論述的內容則多半主張道德、天主教、人性與全體傾向 (Martinson, 2012: 393-6)。

53. 以政黨論述爲單位，有提到現實主義論述的共 18 次，相較之下，新制度主義及歷史文化論都只有 15 次。

的「緊急授權」的狀況，也就是說在緊急情況時可以進行戰鬥任務，這已經是向前邁進了一步。

到了科索沃「盟軍空襲行動」，德國強調自己是包括在地位與能力負擔都與其他國家相同的伙伴，在意願上面也破除了不願意參與戰鬥任務的禁錮，但面對空襲行動未達目標，批評聲浪又起的時候，當時施洛德總理則以歷史因素，強調德國不能自己走自己的路，而外長費雪則認為「不再種族屠殺」已經超越「不再戰爭」的概念 (Wittlinger and Larose, 2007: 488)。德國出兵阿富汗與出兵科索沃案已有相當大的不同，不論在人數、防衛及攻擊範圍等都已擴大，但是結果亦然。而傳統的歷史文化，使其在任務上盡量選擇較穩定、較安全地區進行重建，避免參與戰鬥，不過，德國仍強調出兵行動應盡量符合國際法的要求，與相關國際組織的決定以及多邊行動的原則，甚至在阿富汗北部地區擴大重建區，德國也找其他國家作為共同領導國，例如荷蘭等。整體而言，歷史文化與制度因素，從原先的出兵的阻礙與前提，已經轉變成為實質干預進行鋪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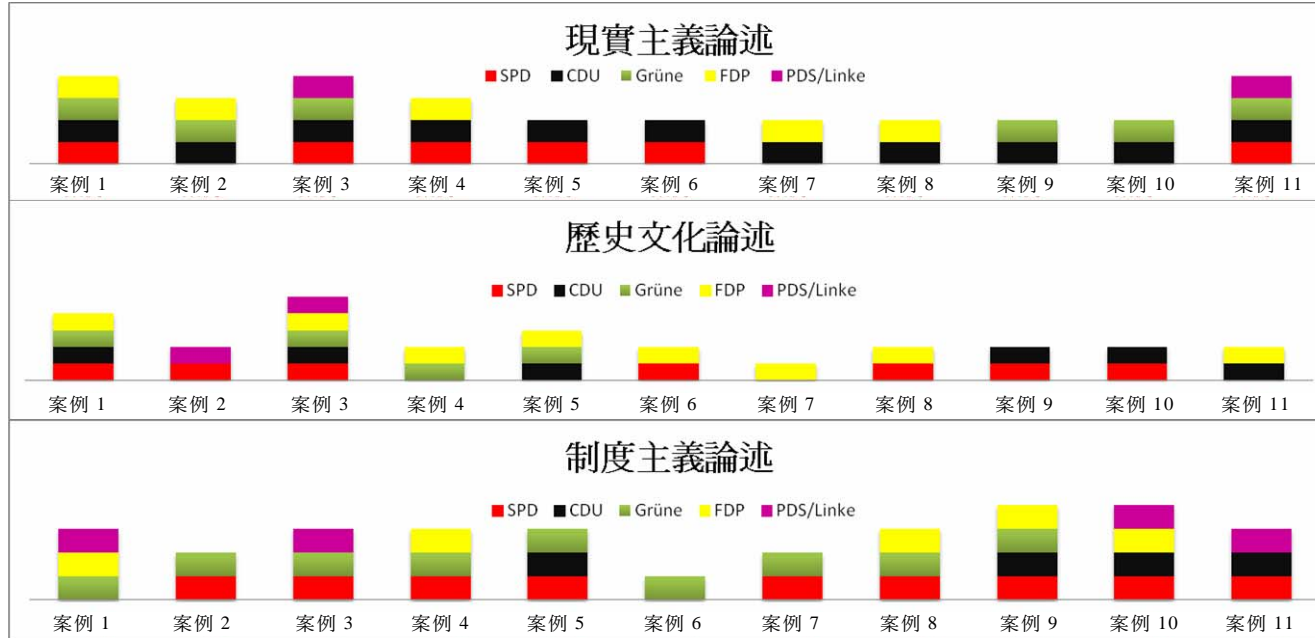
而一旦任務開展之後，現實主義與歷史文化論的論述便明顯下降，而變成新制度主義論述一枝獨秀。傳統認為歷史與文化深深影響著德國出兵政策的說法，在相關論述中反而並不十分顯著，只有在特定較具爭議的案例中，利用人道或歷史等說法，來支撐出兵的正當性，在較不具爭議的延長案中，甚至沒有扮演任何角色。這樣的結果與 John S. Duffield (1998) 的說法大致符合。他認為在相對和平的時期，國際制度與政治文化兩個因素是研究統一後的德國安全政策兩個重要的變項，但相對不穩定時則仍是現實主義 (Duffield, 1998: 15)，也顯示德國出兵政策的系統性與一致性。

本文與 Martinson (2012) 一文最大的差異，在於本文發現政黨在面臨政黨執政與否以及任務開展階段的考量，會超越其傳統立

場。比方說社民黨雖然傳統強調新制度主義，但執政或任務開展時，仍強調現實主義論述；基民黨雖傳統強調現實主義論述，但當其重新執政之後，就著墨新制度主義論述多一些。綠黨如前文所述，受到執政與否因素較強，執政時期以新制度主義論述多一些，但在野時期對於現實主義論述的強調則相對增加。其他在本文相關案例中幾乎沒有執政的自民黨（只有一次）與極左派政黨，較能維持其傳統立場。

另外，根據本文的相關發現，本文認為採取政治人物論述的質化研究，一方面可以避免量化分析過度簡化案例，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淪於理論解釋力之爭，有助於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外交政策之分析。

圖三 德國政黨論述與國際關係理論之關聯



圖三註：本圖計量方式與圖一、二有所差異，僅針對該政黨是否在相關案例中有提到該理論的論述作為計量單位（亦即只有是與否），以分析該政黨的論述走向。

參考書目

- Baumann, Rainer and Gunther Hellmann. 2001. "Germany and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Total War', the 'Culture of Restrain' and the Quest for Normality." *German Politics* 10, 1: 61-82.
- Baumann, Rainer. 2001. "German Security Policy within NATO." in Volker Rittberger. ed.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Theories and Case Studies*: 141-184. Manchester and N.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iehl, Heiko et al. 2000. *Motivation von Soldaten im Auslandseinsatz, SOWI-Arbeitspapier Nr.125*. Strausberg: Sozial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 der Bundeswehr.
- Biermann, Rafael. 2002. ed. *Deutsche Konfliktbewältigung auf dem Balkan. Erfahrungen und Lehren aus dem Einsatz*. Baden-Baden: Nomos Verlag.
- Bjola, Corneliu. 2005. "Legitimizing the Us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Communicative Action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 2: 266-304.
- Borkenhagen, Frany H.V. 1997. *Außenpolitische Intereseen Deutschlands. Rolle und Aufgaben der Bundeswehr*. Bonn: Bouvier Verlag.
- Bundesregierung. 2003. "'German Assistance for Iraq-donors' Conference in Madrid." in http://eng.bundesregierung.de/top/dokumente/Artikel/ix_546367.htm?template=single&id=546367_4317&script=1&ixepf=_546367_4317. Latest update 1 Jan. 2003.

- Bundestag. 1998a. "Antrag der Bundesregierung. Deutsche Beteiligung an den von der NATO Geplanten Begrenzten und in Phasen Durchzuführenden Luftoperationen zur Abwendung einer Humanitären Katastrophe im Kosovo-Konflikt. 12. October, 1998."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3/114/1311469.pdf>. Latest update 8 January 2013.
- Bundestag. 1998b.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248 Stizung. Bonn, Freitag, den 16. Oktober, 1998."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3/13248.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 Bundestag. 1998c. "Antrag der Bundesregierung. Deutsche Beteiligung an der NATO Luftüberwachungsoperation über dem Kosovo. 4. November, 1998."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4/000/1400016.pdf>. Latest update 8 January 2013.
- Bundestag. 1998d.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3 Stizung. Bonn, Dienstag, den 10. November, 1998."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4/14003.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 Bundestag. 1998e.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6 Stizung. Bonn, Freitag, den 13. November, 1998."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4/14006.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 Bundestag. 1998f. "Antrag der Bundesregierung. Deutsche Beteiligung an Möglichen NATO-Operationen zum Schutz und Herausziehen von OSCE-Beobachten aus dem Kosovo in Notfallsituationen. 18.

November, 1998.”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4/003/1400397.pdf>. Latest update 8 January 2013.

Bundestag. 1998g.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8 Stizung.”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4/14008.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1999a. “Antrag der Bundesregierung. Deutsche Beteiligung an der Militärischen Umsetzung eines Rambouillet-Abkommens für den Kosovo sowie an NATO-Operationen im Rahmen der Notfalltruppe (Extraction Force). 22. Februar, 1999.”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4/003/1400397.pdf>. Latest update 8 January 2013.

Bundestag. 1999b.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22 Stizung. Bonn, Donnerstag, den 25. Frebruar, 1999.”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4/14022.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1a. “Antrag der Bundesregierung. Beteiligung Bewaffneter Deutscher Streitkräfte an dem Einsatz einer Internationalen Sicherheitsunterstützungstruppe in Afghanistan auf Grundlage der Resolutionen 1386 (2001), 1383 (2001) und 1378 (2001) des Sicherheitsrats der Vereinten Nationen.”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4/079/1407930.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1b.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210 Stizung. Berlin, Sonnabend, den 22. Dezember 2001.”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4/14210.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2a.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30 Stizung. Berlin, Donnerstag, den 25. März, 2002.”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4/14030.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2b.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31 Stizung. Berlin, Freitag, den 26. März, 2002.”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4/14031.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2c. “Antrag der Bundesregierung. Fortsetzung der Beteiligung bewaffneter deutscher Streitkräfte an dem Einsatz einer Internationalen Sicherheitsunterstützungstruppe in Afghanistan auf Grundlage der Resolutionen 1386 (2001) vom 20. Dezember 2001 und 1413 (2002) vom 23. Mai 2002 des Sicherheitsrats der Vereinten Nationen.”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4/092/1409246.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2d.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243 Stizung. Berlin, Freitag, den 14. Juni, 2002.”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4/14243.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2e. “Antrag der Bundesregierung. Fortsetzung der Beteiligung Bewaffneter Deutscher Streitkräfte an dem Einsatz einer Internationalen Sicherheitsunterstützungstruppe in Afghanistan auf Grundlage der Resolutionen 1386 (2001) vom 20. Dezember 2001, 1413 (2002) vom 23. Mai 2002 und 1444 (2002) vom 27.

November 2002 des Sicherheitsrats der Vereinten Nationen.”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5/001/1500128.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2f.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17 Stizung. Berlin, Freitag, den 20. Dezember, 2002.”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5/15017.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3.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70 Stizung. Berlin, Freitag, den 24. Oktober, 2003.”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5/15070.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4.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129 Stizung. Berlin, Donnerstag, den 30. September, 2004.”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5/15129.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5a. “Antrag der Bundesregierung. Fortsetzung der Beteiligung Bewaffneter Deutscher Streitkräfte an dem Einsatz einer Internationalen Sicherheitsunterstützungstruppe in Afghanistan unter Führung der NATO auf Grundlage der Resolutionen 1386 (2001), 1413 (2002), 1444 (2002), 1510 (2003), 1563 (2004) und 1623 (2005) des Sicherheitsrates der Vereinten Nationen.”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5/059/1505996.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5b.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187 Stizung. Berlin, Mittwoch, den 28. September, 2005.”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5/15187.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6a. “Antrag der Bundesregierung. Fortsetzung der Beteiligung Bewaffneter Deutscher Streitkräfte an dem Einsatz der Internationalen Sicherheitsunterstützungstruppe in Afghanistan unter Führung der NATO auf Grundlage der Resolutionen 1386 (2001) vom 20. Dezember 2001, 1413 (2002) vom 23. Mai 2002, 1444 (2002) vom 27. November 2002, 1510 (2003) vom 13. September 2005 und 1707 (2006) vom 12. September 2006 des Sicherheitsrates der Vereinten Nationen.”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6/025/1602573.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6b.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54. Sitzung. Berlin, Donnerstag, den 21. September, 2006.”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6/16051.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6c. “Entschließungsantrag zu der Ersten Beratung des Antrags der Bundesregierung – Drucksache 16/2573.”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6/026/1602623.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6d.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54. Sitzung. Berlin, Donnerstag, den 28. September, 2006.”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6/16054.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7a. “Antrag der Bundesregierung. Beteiligung

Bewaffneter Deutscher Streitkräfte an dem Einsatz einer Internationalen Sicherheitsunterstützungstruppe in Afghanistan unter Führung der NATO auf Grundlage der Resolutionen 1386 (2001), 1413 (2002), 1444 (2002), 1510 (2003), 1563 (2004), 1623 (2005) und 1707 (2006) des Sicherheitsrates der Vereinten Nationen.”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6/042/1604298.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7b.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81 Stizung. Berlin, Mittwoch, den 28. Februar, 2007.”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6/16081.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7c.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86 Stizung. Berlin, Freitag, den 9. März, 2007.” in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6/16086.pdf>.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Bundestag. 2009. *Rule of Procedure of the German Bundestag*. Rheinbreitbach: Neue Darmstädter Verlagsanstalt.

Bundeswehr. 2012. “Zehn Jahre Einsatz in Afghanistan.” in <http://www.bundeswehr.de/portal/a/bwde!/ut/p/c4/HctBDoMwDAXRs3ABe8-utyhsIgd-iYG6VewWKacHodm-4ZGvTP66SOjHZOcnD5P2-aB8zCCouSAa6K3ul4CRurxoxi98KqgZGIUWaiiWVikV6Z6i8Xd7dCdnVHXh/>. Latest update 16 May 2012.

Cloutier, Joey et al. 2004. “Becoming a ‘Normal’ Actor in World Affairs: Germa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Since Unification.” in Onnig Beylerian and Jacques

- Lèvesque. eds. *Inauspicious Beginnings. Principal Power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1989-1999*: 107-130.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 Uni Press.
- Dalgaard-Nielsen, Anja. 2005. "The Test of Strategic Culture: Germany, Pacifism and Pre-emptive Strikes." *Security Dialogue* 36, 3: 339-359.
- Dieterich, Sandra et al. 2010. *Parliamentary War Powers: A Survey of 25 European Parliaments*. Geneva: Geneva Centre for the Democratic Control of Armed Forces.
- Duffield, John S. 1998. *World Power Forsaken. Political Cultur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fter Unific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 Press.
- Erb, Scott. 2003. *German Foreign Policy: Navigating a New Era*.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Erberic, Ute. 2004. *Auslandseinsätze der Bundeswehr und Europä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Köln, Berlin, München: Carl Hlymanns Verlag KG.
- Fischer, Joschka. 2007. *Die Rot-Grünen Jahre. Deutsche Außenpolitik-vom Kosovo bis zum 11. September*. Köln: Kiepenheuer & Witsch.
- Freuding, Christian. 2007. *Streitkräfte als Instrument Deutscher Außen-und Sicherheitspolitik seit Mitte der neunziger Jahre*. Hamburg: Helmut Schmidt Universität.
- Friedrich, Roland. 2005. *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im Kosovo-Konflikt*. Wiesbaden: VS Verlag.
- Gilch, Andreas. 2005. *Das Parlamentsbeteiligungsgesetz Die*

- Auslandsentsendung der Bundeswehr und deren Verfahrensrechtliche Ausgestaltung.* Würzburg: Universität Würzburg.
- Harnisch, Sebastian and Hanns W. Maull. 2001. *Germany as a Civilian Powe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Harnisch, Sebastian. 2001.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Post-Unificati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German Politics* 10, 1: 35-60
- Harnisch, Sebastian et al. 2004. *Deutsche Sicherheitspolitik. Eine Bilanz der Regierung Schröder.* Baden-Baden: Nomos.
- Hawel, Marcus. 2007. *Die normalisierte Nation.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und Außenpolitik in Deutschland.* Hannover: Offizin-Verlag.
- Jacobs, Jörg. 2006. "Germans to the Front? Attitudes Towards a German Contribution to Worldwide Military Mission." *Debatte* 14, 3: 271-281.
- Jäger, Thomas et al. 2007. *Deutsche Außenpolitik Sicherheit, Wohlfahrt, Institutionen und Normen.*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 Joetze, Günter. 2001. *Der Letzte Krieg in Europa? Das Kosovo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Stu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DVA).
- Jørgensen, Nils-Johan. 2006. *Culture and Power in Germany and Japan. The Spirit of Renewal.* Folkestone. Kent: Global Oriental.
- Kanz, Martin. 2003. "Dismissing the Draft Germany Debates Its Military Future."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24, 4: 37-41.
- Klein, Paul and Dieter Waltz. 2000. ed. *Die Bundeswehr and der Schwelle zum 21. Jahrhundert.* 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 Krause, Joachim. 2005. "Deutsche Sicherheitspolitik im Spannungsfeld

- zwischen Transatlantische und Eurogaullistische Orientierung.” in Reinhard C. Meier-Walser. ed. *Deutsche Sicherheitspolitik Rückblick, Bilanz und Perspektiven* : 38-48. München: Hanns-Seidel-Stiftung.
- Krippendorff, Klaus. 2004. *Content Analysis :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 Lantis, Jeffrey. 2002. “The Moral Imperative of Force: The Evolution of German Strategic Culture in Kosovo.” *Comparative Strategy* 21, 1: 21-46.
- Löfflmann, Georg. 2008. *Verteidigung am Hindukusch? Die Zivilmacht Deutschland und der Krieg in Afghanistan*. Hamburg: Diplomica Verlag GmbH.
- Longhurst, Kerry. 2004. *Germany and the Use of Force*. Manchester and N. 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Loquai, Heinz. 2000. *Der Kosovo-Konflikt- Wege in einen Vermeidbaren Krieg. Die Zeit von Ende November 1997 bis März 1999*. Baden-Baden: Nomos.
- Markovitz, Andrei and Simon Reich. 1997. *The German Predicame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sen, Kåre Dahl. 2005. *Alleingang German Red-Gree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slo: Institutt for forsvarsstudier (IFS).
- Martinson, Jeffrey D. 2012. “Rediscovering Historical Memory: German Foreign Military Intervention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the Second Lebanon Wa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8, 4: 389-407.
- Mauß, Hanns W. 2006. ed. *Germany's Uncertain Power Foreign Policy of the Berlin Republic*. N.Y.: Palgrave Macmillan

- NATO. 2007. "Kosovo Conflict Background." in <http://www.nato.int/KFOR/docu/about/background.html>. Latest update 8 January 2013.
- Otte, Max and Jürgen Greve. 2000. *A Rising Middle Power?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formation, 1989-1999*. N.Y.: St. Martin's Press.
- Ragin, Charles C et al. 2004. "Workshop on Scientific Foundation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in <http://www.nsf.gov/pubs/2004/nsf04219/nsf04219.pdf>. Latest update 8 January 2013.
- Rathbun, Brian C. 2006. "The Myth of German Pacifism."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4, 2: 68-81.
- Rauch, Andreas M. 2006. *Auslandseinsätze der Bundeswehr*. Bonn: Nomos.
- Security Council. 1998. "Resolution 1203 (1998)." in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kos%20SRES1203.pdf>. Latest update 8 January 2013.
- Security Council. 2004. "Resolution 1563 (2004)." in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Afgh%20SRES1563.pdf>. Latest update 8 January 2013.
- Schröder, Florian. 2005. *Das Parlamentarische Zustimmungsverfahren zum Auslandseinsatz der Bundeswehr in der Praxis*. Köln, Berlin, München: Carl Heymanns Verlag KG
- Tewes, Henning. 2002. *Germany, Civilian Power and the New Europe*

Enlarging NATO and the European Union. N.Y.: Palgrave.

- Wagner, Wolfgang. 2005. "From Vanguard to Laggard: Germany in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German Politics* 14, 4: 455-469.
- Wagnsson, Charlotte. 2008. *Security in a Greater Europe: The Possibility of A Pan-European Approach*, Manchester.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Wittlinger, Ruth and Martin Larose. 2007. "No Future for Germany's Past? Collective Memory and German Foreign Policy." *German Politics* 16, 4: 481-495.
- Wölfle, Markus. 2005. *Die Auslandseinsätze der Bundeswehr und Auswirkungen auf die Roll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m Internationalen System*. Bonn: Bernard & Graefe Verlag.
- 甘逸驊。2007。〈歐盟「柔性強權」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批判〉。《問題與研究》46, 4: 1-25。(Kan, Yi-Hua. 2007. "'Civilian Power' as the EU'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Wenti Yu Yanjiu* 46, 4: 1-25.)
- 吳東野。1993。〈聯合國和平維持部隊在國際區域衝突的角色---從德國派兵海外的爭議談起〉。《問題與研究》32, 10: 25-33。(Wu, Tung-Yeh. 1993. "The Role of UN Peace-keeping Corps on International Regional Conflicts --- The Disputes of German Military Employment Abroad." *Wenti Yu Yanjiu* 32, 10: 25-33.)
- 吳東野。1994。《「德國問題」與歐洲強權戰略安全關係(1949-1991)》。台北市：五南。(Wu, Tung-Yeh. 1994. "*German Issues*" and Strategic Security Relations among European Major

Powers (1949-1991). Taipei: Wu-Nan.)

郭秋慶。2006。《歐洲國家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Kuo, Chiu Ching. 2006.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ies of European Countries*. Taipei: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湯紹成。1997。〈德國外交政策取向及其對兩岸關係〉。《問題與研究》36，10：1-11。(Tan, Shaocheng. 1997. "German Foreign Policy Approach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Wenti Yu Yanjiu* 36, 10: 1-11.)

湯紹成。2001。〈當前德國外交政策淺析〉。《問題與研究》40，1：15-28。(Tan, Shaocheng. 2001. "Recent German Foreign Policies." *Wenti Yu Yanjiu* 40, 1: 15-28.)

熊焯。2008。《統一以後的德國外交政策（1990-2004）》。北京：世界知識。(Xiong, Wei. 2008. *Tongyi Yihou de Deguo Waijiao Zhengce (1999-2004)*. Beijing: WAP)

蔡政文。2007。〈全球化趨勢下的全球、區域及國家建構：國際關係理論及其適用〉。《全球化趨勢下之世界、區域與國家建構》：1-18。高雄市：高雄大學政法系編委會。(Tsai, Cheng Wen. 2007.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their Practices ---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 Building of Taiwan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in NUK Editorial Committee.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 Building of Taiwan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1-18. Kaohsiung: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Law,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Rediscove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on German Use of Force Policies --Parliamentary Debates and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Kosovo and Afghan

Wang Shun Wen *

This research tests theories for explaining German decisions on use of force policies from Kosovo to Afghanistan. It examines the main discourses of German politicians through debates in the Bundestag (German Parliament). With cross-cases and cross-parties examin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e strength of neo-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weakness of historical-cultural analysis. Also, results show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art and the extension of mission authorization. German politicians tend to use realist discourses at the first mandate of missions, but neo-institutionalism at the mandate of mission extension.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German decision making vis-à-vis use of force policies is stable and systematic as John S. Duffield's findings showed in 1998.

Keywords: German use of Force Policy, Kosovo, Afghanistan, IR Theorie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